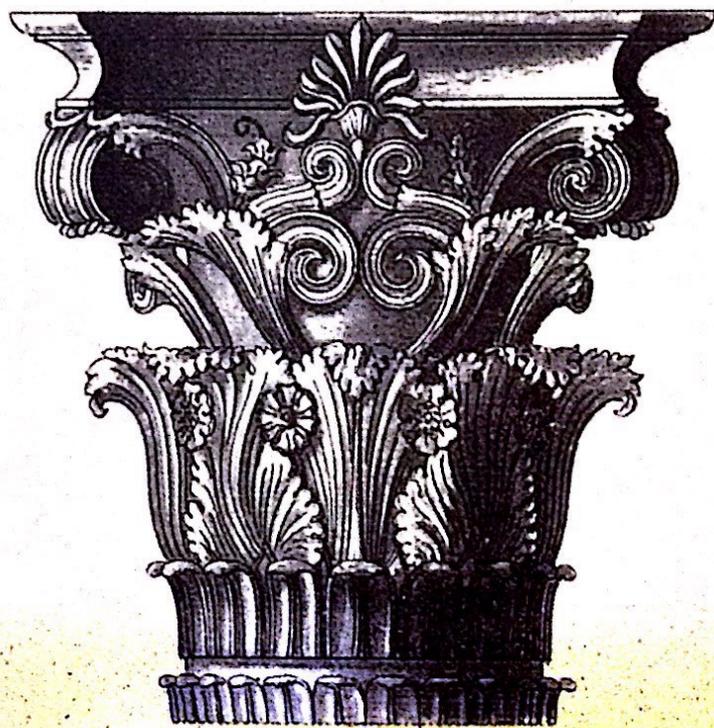


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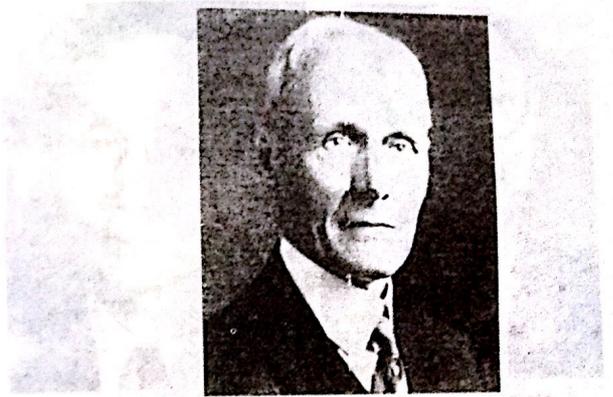
之江大学

队克勋 / 著

刘家峰 / 译



珠海出版社



费佩得校长, 1922 -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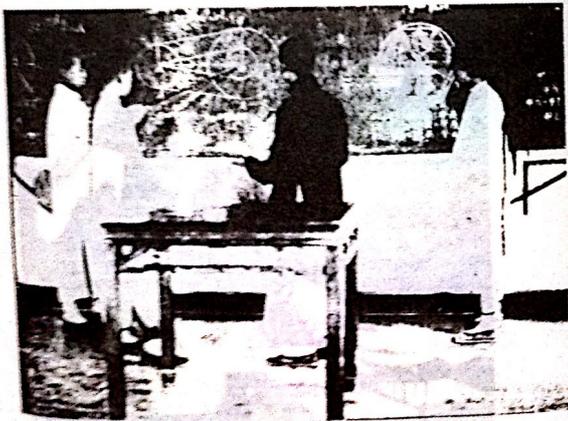
明思德校长, 1938 -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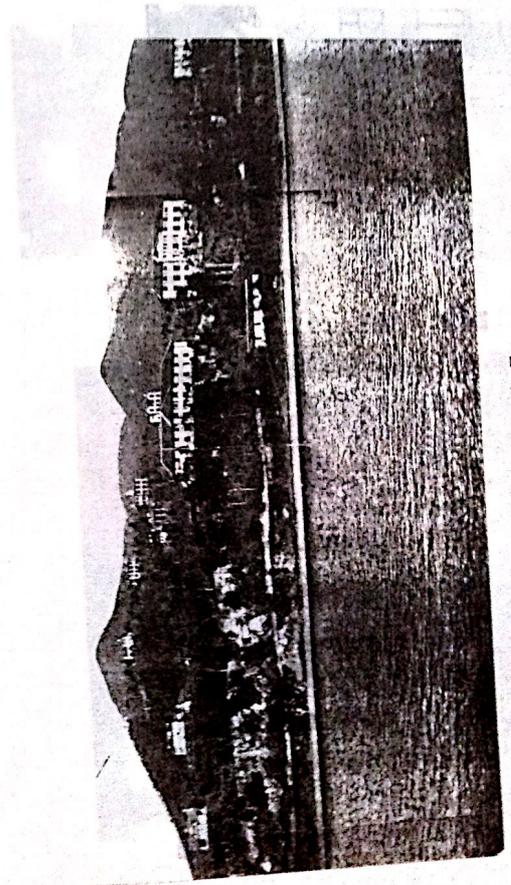
司徒华林, 1916 - 19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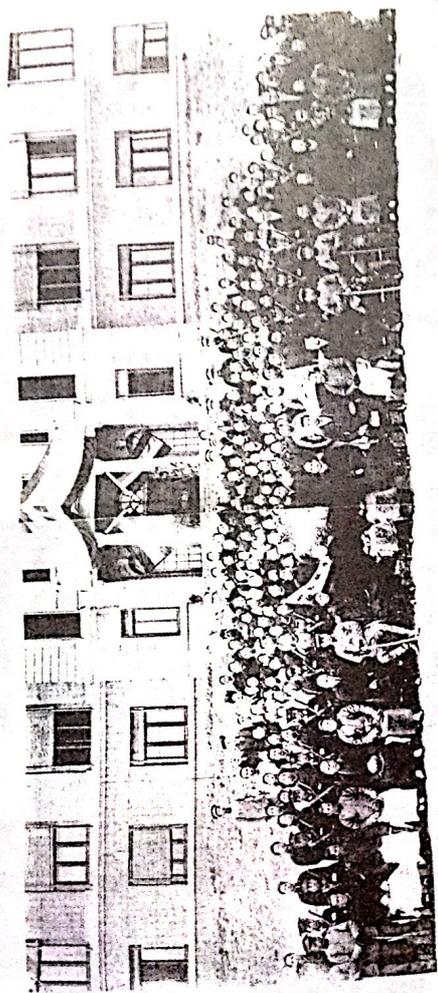
李培恩, 1928 - 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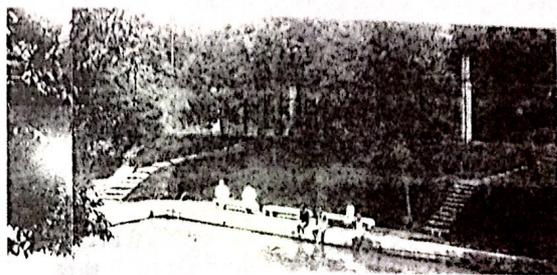
平面几何课(约在1900至1906年)



之江大学校园全景



1912年12月10日，孙中山视察之江学堂



游泳池



裘德生(坐)王令庚(站)与校友合影

目 录

总序

作者简介

致谢

第一章	在宁波的早期(1845—1867)·····	1
第二章	在杭州的扩展(1867—1910)·····	13
第三章	在新校园(1911—1920)·····	25
第四章	为保持高等学校而奋斗·····	42
第五章	立案失败与学校关闭·····	57
第六章	学校重新开办,采纳男女合校·····	64
第七章	中日战争,第一阶段(1937—1941)·····	83
第八章	中日战争,第二阶段(1941—1945)·····	94
第九章	复员·····	105
第十章	消失·····	118
第十一章	回顾与评价·····	132
附录 A	西方教职员·····	138
附录 B	中方教职员·····	142
索 引	·····	153

其时,耶稣基督福音传布,福音派、圣公会、新教、天主教、基督教会等相继在中国建立,教会大学随之兴起。1900年,中国教会大学达到100所,1910年,中国教会大学达到150所,1920年,中国教会大学达到200所,1930年,中国教会大学达到250所,1940年,中国教会大学达到300所,1950年,中国教会大学达到350所。

总 序

章 开 沅

教会大学曾经是中国新式高等教育的先驱。到1882年,至少有一所中国教会学校已经具有高等教育(Post-Secundary)性质。12年以后,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年(1894),教会在中国创办的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学院(College)已有四所,迄至1950年,教会大学增加到14所,另加两所学院,学生总数13 000人。其中两所在华北,三所在华南,七所在华东,两所在华中,一所在华西,一所在东北,其辐射力基本上覆盖全国。

中国教会大学诚然是与西方殖民主义相伴而来,并且其初始阶段又主要是为基督教的传播服务。但到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民族主义浪潮的猛烈冲击下,中国教会大学不能不作相应的自我调适,经过本土化、人间化、学术化的艰苦历程,逐渐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本世纪30年至40年代,中国教会大学曾经具有较高的成就与国际地位。他们与非洲的教会学校相比,显然处于较高的层次;与印度的教会大学相比,为数虽较少而质量则较高;与日本的教会大学相比,则具有较强的与公立大学竞争的实力,因为他们在医学、农

目 录

1	1840—1860年	第一章
15	1861—1881年	第二章
22	1882—1911年	第三章
38	1912—1949年	第四章
55	1950—1979年	第五章
62	1980—1999年	第六章
68	2000—2019年	第七章
75	2020—2029年	第八章
82	2030—2039年	第九章
89	2040—2049年	第十章
96	2050—2059年	第十一章
103	2060—2069年	第十二章
110	2070—2079年	第十三章
117	2080—2089年	第十四章
124	2090—2099年	第十五章
131	2100—2109年	第十六章

林、法学、商学、社会学、新闻学、图书馆等学科领域,都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势。

根据 1937 年的统计,在 10 000 个中国教会大学毕业生中,3 500 余人从事教育(其中 2/3 执教于教会学校),500 余人从事宗教与社会工作,100 余人任牧师,近 700 人从事医务工作,300 余人以法律为业,近 900 人服务于公用事业,经商者则为数甚少。1936 至 1937 年期间,还有 1 100 余名毕业生继续深造于研究所或成为研究人员,其中有 300 余人留学海外。由此可见,教会大学虽有宗教背景,但毕业生从事神职与其他专职宗教工作者人数并非甚多。大多数毕业生都是服务于世俗社会各个层面,或从事较高层次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的。

但是由于人们所已熟知的中国教会大学内部和外部的种种原因,他们于 50 年代初从此绝迹于中国大陆。正如曾在金陵大学任教的芳威廉博士(William B. Fenn)所说:“建筑和设备依然留存,教师可能在新的学校任职,但教会大学从此消逝。”然而,芳威廉的结论并非全然消极。他说:“教会大学的贡献,是培养了一大批有良好训练且在社会各层面有很大影响的男性和女性,而这正是国家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中国教会大学的重要贡献还在于增进国家之间相互了解与友谊。通过学校提供的语言、知识、价值和外国教职员,引进了西方好的东西。同时,也通过他们,中国的知识被翻译和示范而介绍到西方。他们担任精神的和文化的使节,协助向东方解释西方,向西方解释东方,虽然受到帝国主义的牵连和外洋性格的

妨碍,作为西方文化的介绍者,他们参与了中国文化、社会和政府的伟大革命。”(《教会大学在变革的中国》)

当然,中国教会大学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绝非三言两语所能讲得清楚,而且评论者由于各自的社会文化背景,其视角与评判标准也必然各有自己的特点。但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即对于在中国存在半个世纪以上的这一特殊教育群体,必须认真加以研究,包括其正面的与负面的社会效应及历史经验,否则就不可能对中国近代教育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获致全面的理解。

我们对教会大学史的研究起步甚晚。90 年代以来情况虽有所改善,但内地学者对海外西方著作与档案文献的了解仍多局限。为了推动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进展,我们决定出版《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丛书》,把国内外有代表性的相关著作与文献陆续介绍给研究或关心这一课题的读者。我们首批编辑付印的共有十本书。其中有三本是国内学者的学术专著,即董黎的《中国教会大学建筑研究》,史静寰的《从狄考文到司徒雷登》,徐以骅的《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都是颇有深度的力作。其他七本则译自从 1954 年开始由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主持编写出版的系列丛书,包括福建协和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之江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华中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华西协合大学。这系列丛书虽然缺乏足够的研究深度,但由于作者大多曾在各个教会大学工作,而且有些人还任职甚久,他们对教会大学历史情况的陈述比较起来更

贴近于当年的实际。即使是作者所固有的某些西方偏见与宗教立场,也可以增进我们对于教会大学及其外籍教职员的理解。

我认为,这套丛书的出版,必将有助于读者对中国教会大学获致比较完整的印象,也多少可以为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提供方便。但是,我又必须指出,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现今已有许多新的可喜的进展,保存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的中国教会大学档案文献早已全部公开,国内各地收藏的相关资料也得到日益深入的发掘与利用。有志于这一课题研究的年轻学者,需要把这套丛书作为必要的参考和入门,然而却决不可为这些作者的陈述与解释所束缚。应该更为艰苦地深入发掘大量确凿的原始资料,进行多视角和多层面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的独特而有价值的见解。

这套丛书是一个公开的园地,我们期待着更多的研究中国教会史的学术佳作刊行问世!

作者简介

队克勋(Clarence Burton Day),1911年获汉密尔顿学院(Hamilton College)文学学士学位;1914年获旧金山神学院神学学士学位;1931年获硕士学位;1923年获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30年获哈特福德神学院(Hartford Seminary)哲学博士学位。

1914年被按立为长老会牧师;曾在爱丁堡和牛津从事比较宗教研究,一年后即1914年到达中国。

1919-1943年与1948-1951年任之江大学英语系主任。1943年2月至9月被拘押到上海,后被遣返。

除在之江大学教书外,还在以下学校任教:1944-1945年在旧金山神学院;1945-1946年在肯塔基州的丹维尔(Danville)中央学院;1946-1947年在西巴基斯坦雷豪(Lahore)的福曼学院(Forman College);1951-1953年在宾州林肯大学。1953年在纽约任中国学生与校友服务协会的副干事,1944-1945年任纽约威特敏斯特长老会教堂的牧师。

著有《中国农民信仰》(*Chinese Peasant Cults*)和多篇宗教比较研究的文章;编著《当代英语读物》(*Current Readings in English*)和《工程英语》(*English for Engineers*)。

致 谢

作者感谢美国长老会海外布道会,使他能使用它在纽约的图书馆,感谢图书管理员 W. 奥布瑞女士及她的助手 M. 布朗小姐给予他热情周到的服务。他也感谢美国长老会世界差会董事会纳什维尔(Nashville)办事处的 L. H. 兰卡斯特博士为他提供了大量信息,感谢长老会和更正会的历史基金会会长 T. H. 斯宾思博士补充了人事方面的资料。

作者还要特别感谢王令赓(Elmer. L. Mattox)博士的大量帮助,他虽已八十高龄,但仍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甚至长途跋涉到纽约,从成堆的差会和董事会报告及教会杂志中拣选出 70 页关于早期宁波的资料。也感谢马尔济先生(Arthur W. March)先生为一些疑点特意跑到加利福尼亚向王令赓博士请教。

王令赓博士、费佩德博士(Robert F. Fitch)、明思德博士(Dr. Robert J. McMullen)和顾敦博士读了手稿,所提建议皆被采纳。感谢郭查理牧师(Rev. Charles H. Corbett)编辑此稿。最后作者还要感谢他的夫人,她一直在帮助修改、打印,也做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工作。

队克勋

第一章 在宁波的早期
(1845—1867)

当外国人被允许在中国居住时,美国长老会海外差会董事会在 1873 年决定到中国传教。为抢先一步,差会派传教士赴新加坡学习汉语。其中一名传教士在菲律宾群岛附近遇险,就改道去了澳门。(当英国与中国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口岸时,美国知道,不久他们也会拥有同样的权利。这些权利在 1844 年 7 月签订的《望厦条约》中得到了,条约在 1845 年 1 月被批准,但长老会的先锋传教士并没有等到条约签订。传教士中有 2 人于 1843 年从新加坡到了厦门,但他们在厦门只是暂时的停留。第一个长老会永久布道站是由麦卡第在宁波建立的,他是医学博士,1844 年 6 月到达那儿,那时,他还单独一人。很快,礼查威牧师(Rev. Richard Way)和科勒(Cole)夫妇加入他的布道站。科勒先生是一位印刷工,从美国带来一套印刷设备和汉字活字板。1845 年 4 月,牧师卡勃逊(M. S. Culbertson)、露梅丝女士(A. W. Loomis)以及曾在去新加坡

1837

1842年: 照像
2100, 浙江宁波
五口通商: 杭州
共商= (We) Reverend
牧师

的途中遇险的劳瑞牧师(W. M. Lowrie)来到后,力量加强了。麦卡第博士已开办了一座医院,科勒先生创立了一个印刷所。

1845年在宁波创办的崇信义塾值得提一提。^①麦卡第博士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述的:“我们决定开办一个男童寄宿学校,由礼查威负责,为能协助他做些工作以及能负责差会建筑事务,我应暂时将医院交给麦卡高湾博士(Mc Gowan),我不自己做饭了,一位很忠诚的中年人能够替我张罗这些事,我的医院有两位男童助手,其中一位担任了助理教师。”^②应介绍一下麦卡高湾博士,他是美国浸礼会传教士,4月份到了宁波。当麦卡高湾博士夏天离开宁波去避暑时,麦卡第很快回到他的医院,他良好的医术每天能吸引150—200名病人来就诊。

1846年科勒夫人开办了一所女童寄宿学校,第二年她与他们中的年长者麦卡第博士一起组织了一个教堂。这个教堂还有一家医院、一处印刷所和两所学校已开始了工作,布道站创建三年已颇具规模^③。

宁波布道站人员时常变动,他们的责任也时常更换。礼查威先生不仅全部身心投入到崇信义塾,也要帮助做其他事情,如在印刷所帮忙。他在宁波工作了十五年,从

① 斯皮尔·罗伯特(Speer, Robert E.):《远东的先锋传教士》(麦卡第博士传记)(*A Missionary Pioneer in the Far East of Dr. Bethune Mc Car-tee, M. D.*),第72—73页,第87—89页。

② 斯皮尔,上引书,第89—90页。

③ 斯皮尔,上引书,第90页。

来没休过假,但终于把身体累垮了,1859年不得不离开中国。他好多年得到他姐夫夸特曼牧师(Rev. John W. Quaterman)的帮助,夸特曼献身于崇信义塾,直到1857年患天花逝去。崇信义塾的另一位出色教员是萨缪尔·马丁牧师(Rev. William N. D. Martin),他和更有名望的哥哥丁魁良牧师(Rev. William A. P. Martin)及他们的夫人1850年到达宁波。马丁先生任崇信义塾校长多年,直到1858年因为喉咙严重发炎离开中国。他离开后,倪维斯牧师(Rev. John L. Nevius)任过一段时期的崇信义塾校长^①。后来,格林牧师(Rev. David D. Green)和萨缪尔·道地(Rev. Samuel Dodd)牧师负责学校。

学校的福音目的

因为学校首先被设想成福音机构,因此,基督教义的灌输就成为传教士最关心的事。学校曾长期努力使教员和学生的内心保持浓厚的基督信仰。每个成为基督徒的学生都会带来极大的喜悦。虽然女童学校做了很重要的工作,但崇信义塾必须在这里给予充分关注,因为它将演变成为一所大学,这是这本书的主题。既然这所学校的目标就是培养本土的神职人员,因此大量时间用于学习圣经和教义问答。其他基本科目有经学、作文、书法、算

① 海伦·倪维斯(Nevius, Helen S. C.):《我们在中国的生活》(“Our Life in China”)(*Abiography*)第30,68,82—83页。

术、地理、天文。好多时间花费在翻译合适教材方面,因为那时尚很少有可用的中文教材。教授英语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为多年来这一问题一直处于实验阶段,许多人认为学英语是费用高昂而且危险的奢侈行为。但也有些传教士老师认为在没有更多的书译成中文之前,学习英文是绝对必需的。

作为一个整体的差会工作,由于资金缺乏而经常停顿,一些传教士对此有一种犯罪感,认为学校从美国收到的资金比他们应该得到的数目要多。美国某些教会团体看不见学校的福音机会。很显然,这问题在1866年差会年会上变得尖锐起来,因为就在那时,萨缪尔·道地在崇信义塾的二十一届年度报告中,再次申明了学校的福音目标,强调了这样的事实:学校长期开办会使培养中国人来从事教会工作要比派遣更多的传教士便宜得多。他解释说,在学校住了几年的学生比不识字也没学过圣经的信徒,在基督信仰方面有更清晰的理解。

所有差会布道站都要求雇佣在教会学校受过培训的本土助手。道地先生继续说道:“现在学校十八名男童中,有七名是基督徒。基督徒人数比例比这个学校过去十五年来任何时候报告的比例都要大。这七名基督徒中有五名来自基督教家庭。这些统计似乎表明,只有基督徒的孩子才能来校就读的时机就要来到了,但我们并不认为时机已到。”他在这儿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差会正在争论,政府也在争论。政府1872年发布的“文件”要求“学校只准接受教徒子女”。没有报告表明学

校遵守了规定,因为教员继续主张学校应培养非基督徒男童,使他们能皈依上帝。

自 助

当一些学生对课本学习表现不出多少才华时,学校就试着教他们如裁缝、做鞋和印刷等实用知识。麦卡第博士最早提出这个建议。他的一些同事认为差会应雇佣学校的所有基督徒毕业生做布道员或教员,他对此有不同意见。麦卡第认为并非所有毕业生都适合传教或教学。他在描述第一次教学生实用课程时这样写道:“崇信义塾雇佣了一位鞋匠,就有几位男孩学习做鞋。我帮助一位男孩学习裁缝,又带另一位男孩到我家,让一位帮我工作的刻字工教他刻字。他很快就学到了很高的技巧,一天能刻400个汉字。他刻收在威廉词典(Williams Syllabic Dictionary)中的汉字,有些象我们木雕的方法,这些木刻供上海一家图片报纸排版。

“有一位崇信义塾的学生在结束学业后,我曾教他和我老师的儿子学医学。我老师的儿子后来成为一位外科大夫,这位学生行医五年或六年之后就成为一名著名的大夫,一直到死。”^①

虽然普通百姓怀疑、看不起外国人,政府官员因为最近签订的条约而对外国人稍为宽容,但贫穷家庭仍把自

^① 斯皮尔,上引书,第173-174页。

己的孩子送到这些外国人办的学校里,因为差会能给他们提供食物、住宿、衣服、医疗和最好的教育。如果他们觉得满意,学校会和孩子父母签订合同,以使这些孩子能在学校呆上四年、六年或八年。他们吃饭是免费的,因此就有这个用滥了的词“吃教徒”(Rice Christian,又译作米教徒)。

一天,一个小男孩敲开校门,让校工放他进去,他想上学。他衣衫褴褛,简直像个乞丐。他向我们讲述了他的故事,乍听有些怀疑,但最终证实了他讲的每个细节都是真实的。他家离这儿有150英里,他用了六天时间一路走到这里,虽然他从未出过家门,也不认识路。他出门时仅带了200文铜钱(相当于20美分)来上学。他父亲是个学究,家道日趋衰败,死后他两个妻子和大儿子决定让这个小家伙去学习裁缝——前景令他害怕。他早就听他叔叔讲过宁波的崇信义塾,于是谁也没告诉就离家出走了。他被批准入学,六个月后他哥哥找到了这个小家伙,他叫平风(Ping-fong,音译),他哥哥看他过得很好就很高兴,愿意签订让他学习六年的合同。平风很讨人喜欢,毕业后成了一位布道士。^①

在这所学校早期还很少有违反合同的报告。但不管怎么说,由父母安排的娃娃亲制造了不少麻烦,有一则报道说一个男孩的父亲给他在学校买了一个“小老婆”。她卖了6000文(4美元)。最终在1852年,差会觉得

应解决这个问题,允许与学校签约的每个学生只能与一个教会学校的女生结婚。这个问题似乎解决得不错,因为倪维斯夫人这样写道:“我们女童学校使大多数本地牧师找到了妻子,在这两所学校学生中也有一些幸福的婚姻。”^①

音乐课

音乐很早就成为在华教会教育的重要内容。1854年倪维斯夫人和她丈夫到达宁波六个月之后,开始在这两所学校里教授唱歌,她写的《我们在中国的生活》对此有生动的描述。她说:“我估计大约有40位男孩和30位女孩,再加上其他一些人,在一个教堂里每周聚会两次。我有一块带线条的黑板,可在上面写乐谱,在没有音乐课本的时期它帮了我很大的忙。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第一步是让他们练习合唱,他们努力这样做,但一些人有一个音符,一些人有三个、四个或五个音符唱跑了调;或许八度音阶中每个音或半个音阶都有它的代表……为让他们同声齐唱花了将近两个钟头。我们下一次聚会时,已经能把每个音都唱得很准,然后学第二个音,刀——来,刀——来,来——刀,来——刀,直到唱得或念得精疲力尽;然后再学第三个。”尽管一开始很困难,但倪维斯夫人说经过六或八个月的训练,她的“一支很

^① 倪维斯,上引书,第90页。

^① 倪维斯,上引书,第105—109页。

好的合唱队，能唱所有的四个声部，即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唱得这么准确，当然是很了不起的。”^①

倪维斯夫人离开宁波去从事其他领域的工作，音乐课就由其他人担任，如兰金女士(Mrs. H. V. Rankin)、格林夫人和道地夫人。歌咏活动扩展到其他一些地方，崇信义塾的一位毕业生，后来成为宁波地区的牧师金令余(Kying Ling Yiu, 音译)曾写信给倪维斯：“请告诉倪维斯夫人，她仍在中国讲授音乐。我教男子班，我的夫人教女子班。”^②

杭州布道站开放

人们很早就知道杭州是中国一个美丽的地方，在文学和艺术上久负盛名，因为群山环绕，西湖置身其中，钱塘江流过杭州南门时拐了一个很宽的弯，形成海潮门。有一句人所共知的俗语很形象，“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它的确是地球上的天堂，它平躺在阳光下，南北呈长方形，大运河的终点正对着北门，盛产稻米的上海三角洲这块宽广的冲积平原伸展到东门。马可波罗满怀激情地描述这座城市，称它“是一座高贵、壮观的城市，它的名字意味着它是‘天国城市’，在壮观、美丽方面它应得到世界上

① 倪维斯，上引书，第40—42页。

② 倪维斯，上引书，第43页。

所有其他城市曾获得的名声，它给人带来极大的欢乐，这使得居民把自己想像成在天堂。”^①

杭州也以香客朝圣地而闻名，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信徒沿着山间崎岖小路去朝拜上百的佛教和道教的上帝，这些壮丽的庙观矗立在山顶上或隐藏在西湖周围的山谷之中。直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为了扩建道路，拆除了城墙和城门，沿着湖边的部分成为“洒石城”，整个城市和西湖周围布满了林荫大道，杭州很快成为浙江省机动车交通枢纽，浙江是全国平均最富有的省份。我们把故事扯得太远了。

的
宁波和上海的先锋传教士很早就意识到杭州重要战略意义，但他们没有权利住在那里。实际上他们只被允许在条约口岸周围30英里的地方活动，而杭州离宁波和上海都有130英里远。那时杭州因有一百万居民而闻名天下，是宁波人口的三倍。

由于30英里的规定并未严格执行，宁波的传教士到内地旅行越走越远，丁黉良和兰金曾冒险进了杭州，时间很短，他们被误认为日本人。^② 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形势有了新的变化，条约规定西方人不仅有权住在新增辟的口岸，而且可以持本国领事颁发的护照去内地旅行。尽管这些条约并没有给西方人在条约口岸以外居住的特权，但宁波布道站决定要去杭州安置一个家庭，1859

① 马可波罗，人民图书馆出版，*Marco Polo, Everyman's Library Edition*, 第290页。

② 丁黉良，《花甲记忆》(*A Cycle of Cathay*)，第112页。

年倪维斯和夫人在一个庙里住了好几周,直到当局要他们离开。他们后来很高兴当局那么做,因为紧接着下一年杭州被太平军攻占,他们毫无军纪,大肆抢劫,杀害了成千的居民。^① 1861年12月9日太平军攻占宁波。道地先生写了一个很长的报告讲述他们被洗劫时的恐怖。太平军一直占领了六个月,直到英法联军把他们驱赶出城,这一时期两所学校的学生帮助照顾了上百名逃难的妇女儿童。

太平军的威胁消除后,在杭州开设布道站的问题再次被提出来商量,以答复1866年6月差会总部的来电。一些传教士主张把整个宁波布道站迁到杭州;其他传教士反对这样做。1867年6月19日宁波布道站开了一个特别会议,会上达成协议,传教士将平均分配到杭州、宁波。后来的一次会议决定,格林夫妇和道地夫妇把崇信义塾迁至杭州。1867年秋天,在吕文振的协助下完成了迁校任务,他那时是中国籍教员的头头。

在宁波的建筑用不着就卖掉了,在杭州租了两栋房子,一栋作传教士住房,在皮市巷,一栋作学校和中国教员住房,离皮市巷有三分之二英里远。

这样宁波崇信义塾就变成杭州育英义塾(Presbyterian Boys' School),它后来演变成育英书院(Hangchow Christian College)。(1897年,见p.17) → 1914年之江大学(p.41)

南长老会在前一年即1866年在杭州开设了一个布

道站。1861年美国内战把长老会一分为二。联邦州的长老会众组成他们自己的教派,在内战结束后派遣传教士来到中国。^① 因此就必须在这两个组织中区分北长老会、南长老会。南长老会曾在适当时期与育英书院开展合作。

在宁波、杭州、上海和苏州的北长老会组成华中差会,后改成一个更恰当的名称叫华东差会(East China Mission)。在这同一片广大地区的南长老会组成了中国中部差会(Mid-China Mission)。

早期毕业生

金令余是学校第一位被按立教职的毕业生。他在余姚做了九年牧师。1866年厄运降临他家,妻子突然染上霍乱死去。几天以后他也死于霍乱,留下一个七岁男孩和一个两岁女孩。麦卡第夫妇收养了这两个孩子,并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这个女孩以第一位留学美国的中国女子而闻名。她就是金亚梅博士(Dr. Yamei Kin)。^②

鲍广西(Pao Kuang-hsi)是另一名毕业生,金令余去世后他在余姚任牧师。他在当学生期间,人们描述他

^① 布朗·阿瑟(Brown Arthur J.):《一百年》(One hundred years),第179—182页。

^② 斯皮尔,上引书,第210页;王其民(Wong Chumin,音译)和吴连特(Wu, Lien-teh,音译),《中国医学史》(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第二版,第205页。

^① 倪维斯,上引书,第167—169页。

直译:长老会
男校

第二章 在杭州的扩展 (1867—1910)

是一个意志坚定、高贵的男孩，举止得体，能独立思考，学习很勤奋，成绩也很好，对宗教问题很严肃。”1859年12月，他在毕业时受到了丁韪良的特别赞扬，丁当时是差会监考人员之一。关于这次考试，丁韪良写道：“……三名学生特别值得一提，鲍广西、余松恩 (Yu Tsung-en) 和蒋宁贵 (Chiang Ning-kuei)，他们在学校学了八年或九年，都取得优异成绩。”当他说到当时学校科学方面的教材缺乏时，丁韪良似乎对“学校学识水平提高”印象很深，“课目安排可与美国中等学校相媲美”。鲍牧师的声名持久不衰，他的儿子、孙子、曾孙都以他为榜样，他们都成了福音布道家。

另一位早期毕业生是蒋宁贵牧师，教会主要靠他领导。他先在宁波担任教员，讲授教义问答，后来，在1866年2月25日他帮助长老会在杭州组织了一个教会。他一直在杭州工作，直到退休前几年。

这儿简单提提在崇信义塾忠诚工作的三个人，主要是在1856—1866年间。陆家清 (音译, Lu Chia-ching) 和徐金三 (音译, Hsu Chin-san) 都在记录中提到是教员头头，吕文振是助手，他们都是坚定的基督徒，对孩子的性格养成有着深远的影响。徐金三是教会中最年长的一位长老，1860年去世。“他是一位经典学人，精通圣经；又是一位公道、正直之士，深受学生爱戴。”^①

^① 引自《海外传道士》，1863年4月，第263页。

除了以上参考书目外，这一章的很多资料来自王令康博士精心准备的口述，“在宁波初期”(“The Beginning in Ningpo”)。

育英义塾在道地先生的指导下建立起一套学术训练的高标准，增加了哲学和自然科学课程。1869年7月，学校迁到一个更宽敞、有一幢两层小楼的广场，有充足的空地可用于建造花园和娱乐。秋天，差会在杭州开办了一个神学班，培养神职候选人员，任命倪维斯和道地为教员。第一年的大部分教学工作是由倪维斯承担，他为此在杭州呆了七个月。育英义塾有十名年纪较大的基督徒学生在学习原有课程外又选修了神学课程。

一年以后，宁波的查利·普来斯顿 (Charles F. Preston) 参观了杭州，报告说育英义塾正处于发展阶段。他说：“通过这个学校，我也许可以称为学院，我们已得到宁波几乎所有的支持者。”宁波长老会1875年报告说，十三位牧师候选人中有十一位是育英义塾的学生。上海的司徒德特 (J. E. Studdert) 在1883年写道：他最有希望的几名学医学的学生中有一位叫张纪青 (音译, Chang Chih-ching)，他早年曾在育英义塾受过道地和李曼 (Leaman)

的教育。这位学生之所以学得很快，是因为他能识读药理学中的英文甚至拉丁文。(当然，有一些地区反对在教会学校教英语，如1884年华中差会通过了如下一项决议：“经认真讨论，华中差会决定：教会不鼓励在我们的教会学校学习英语。反对教授英语的主要理由是：(1) 过去的工作并不令人满意；(2) 中国人学英语无一例外都是为了挣更多的钱；(3) 英语永远不会成为中国的语言。”然而，英语教学并没有完全放弃，部分原因是中文教材的匮乏。)

裘德生使课程现代化

1880年，裘德生牧师(Rev. Junius H. Judson)和夫人的到来给学校以新的推动力。裘德生于1876年毕业于汉密尔顿学院，他接替李曼牧师任学校校长，他夫人则负责管理三所主日学校，这些学校是为育英义塾培养预科生的。注册学生很快升到三十四人。裘德生和他的三位中国教员教以下课程，他们称之为门(branches)：中国经学、教义问答、圣经见证、哲学、算术代数、几何、历史、地理、化学、作文、辩论、音乐。这是那时期一所高中所要求的完整课程。1887年秋天，育英义塾举行了第一次毕业典礼，每位毕业生都发表了创造性的演讲。

有一段时间裘德生与差会以及在纽约的差会董事会讨论了他的计划，在育英义塾增添工艺科。他想从美国聘请一位受过培训的人来开这门课，并能给手工训练课

以尊严。但是，由于董事会并未派出这样一个人，工艺科只好由当地一位木匠来负责。他们早期的工作之一是制做木床，以满足学生的需求，1889年注册学生已增加到四十八人。四年或许五年之后，手工训练课曾停过一段时间，因为本地木匠管不了这些孩子。

1887年两场严重的瘟疫袭击了学校，裘德生写道：“这个地方看起来更象一座医院而不是一所学校。”1890年，所有学生都得了腮腺炎，学校不得不停课一段时间。第二年春天，中国其他地方发生了暴乱，在杭州，大约有10 000名学生和其他示威者闹事。这天他们本打算焚烧所有外国人的房子，由于这些地方都设置了警卫，没有造成严重损失。学校继续发展，1892年秋天有五十名学生。格瑞特牧师(J. C. Garritt)教了一段时间，萧芝禧(Dzi Ts-hyi)成为中国教员主管，他是1883年的毕业生。学校工作水准提高，纪律也变好，毕业考试更加严格。在以后两年或三年中学校形成了优良风格，这要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所有中国教员和二十五名学生都是基督徒。

1893年王令庚牧师(E. L. Mattox)及夫人被派到育英义塾工作，开始了长达四十年的合作。王令庚先生毕业于衣阿华的帕森斯学院(Parsons College)，获文学硕士学位。他们到达后不久，王令庚被调到宁波。

1893年，华中差会建议：“育英义塾是我们差会最先进的学校，应首先考虑将其发展为高等学校”。于是育英义塾通过继续开办两个超过高中水平的男子班而发展成

了一所完备的初级学院。这是对中国对现代教育的需求
稳步增长的回应。西方冲击刺激了中国人对更多知识，
尤其是西方科学和语言知识的需求。1894年至1895年
中日战争中中国大败，丧失了对朝鲜的宗主权。之后，中
国开始在现有学校课程中设置新课目，教授“新学”。
1896年杭州当局新开了一座学堂，邀请王令庚帮助他们
设立课程，安装实验设备。1898年，年轻的中国皇帝颁
布了一系列法令，力图从根本上改革教育体制，此即“百
日维新”，在这很久以前，育英义塾就开始帮助发展中国
教育。

到1896年，学校已有六十五名学生，宿舍快容不下
了，学校要求得到美国选民更多的支持。那年，杭州布道
站的报告写道：“我们现在设备齐全，可以招收现在两倍
的学生来上课而不多花一分钱。我们有三十名学生申请
入学，大多来自基督徒家庭，如果有房子能接受他们，
他们中许多人会付学费。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房子，我
们就可以从杭州最好的家庭中招收更多的学生，这样，他
们可能接受上帝的真理，受到福音的影响。我们第一次
同意几名主日学校的学生入学。我们再次向差会及董事
会恳求，满足我们对宿舍的需求，学校工作不会再受挫。
我们感到上帝在为我们的事业祝福，我们期望上帝赐给
我们更多。”

关于校长对学校发展所扮演的角色，王令庚多年以
后曾这样写道：“这些年学校的飞速发展主要归功于裘德
生的勤奋工作。他是第一位把自己的命运长久地与学校

紧密相联的传教士，他把所有时间都献给了教育工作。
以前的那些人，如格林、道地、李曼和李昂(Lyon)，他们
首先也主要是福音布道家，而没有一个是受过训练的教
育家。裘德生对数学和物理特别感兴趣。他从美国获得
了一些多种多样的仪器，用于讲授这两门课，大部分物理
仪器是在学校工厂制作的。在将近四十年里，他是学校的
向导之灵(the guildingspirit)，目睹了学校在许多阶段
所取得的进步。”^①

升格为学院

1897年，华中差会正式称育英义塾为“育英书院”
(Hangchow Presbyterian College)。六年学制，其中英语
作为一门课来讲授，化学或其他课程也同样。授课不用
英语。1897年2月，只想学英语的人另外开了一个班，
共招收了十五名学生，由刚毕业的学生鲍孝儒担任教学。
他和其他两名学生是第一批通过学完所有课程而掌握英
语的毕业生。1898年中国皇帝颁布变法诏令，废除八股
文，在全国设立学校开设英语和数学课，申请学英语的学
生急剧增加，虽然皇帝诏令很快就无效了，但影响仍持续
了几年。

新变化带来了新的经费问题。预科学生需交学费

^① 王令庚，《中国一所基督教大学的变迁》(未出版)，Mattox E. L.,
The Evolution of a Christian University in China”(unpublished manuscript).

12 墨元，正科生需 24 墨元。基督徒的孩子减免一些学费。对特别困难的学生，学校提供打工的机会。1854 年墨元已在中国流通，1 墨元相当于 1000 文铜钱，但墨元慢慢就被其他货币取代了。1 墨元相当于美元 50 分。裘德生先生希望人们对大学提供的这种教育很赞赏，并且希望学生能自付膳食和其他费用的时刻早日到来。因为许多学生交费远不及学校供给他们膳食的费用。教师都想离去，因为他们现在可以到其他学校，或到那些想让子女享受新式教育的富有家庭任教，那里能挣到更多的钱。

爆发义和团运动的那一年

1900 年 1 月，中国教务长的职位发生了变化，萧芝 溥在为学校服务八年之后辞去这一职位，投身于福音工作。周懋功 接替了他的职位。（在北方兴起的旨在把外国人赶出中国的义和团运动严重干扰了这学期的工作。燃起的仇恨不仅指向外国人，也指向中国基督徒。晚春时候，所有在中部地区的美国人都去了上海，杭州的大部分中国基督徒也逃往上海。虽然到秋天他们大部分已返回家中，但学校耽误了整整一个学期的工作，直到 1901 年 3 月裘德生先生回校才重新开学。）他集合了大部分原在校生，又招收了一些新生，学校又开始正常上课了，包括预科班共有 65 人注册。第二年学生人数达到 85 人，但很快就降至 70 人，因为一场严重的霍乱夺去了杭州数千

人的性命，虽然学校没有一人死亡。

1902 年大学学制由原来的六年改为五年，预科班——以后改称中学——由原来四年改为五年；这样改动是为了统一所有教会学校的学制。同年，一座新教堂竣工，并附设了几间教室，因为许多苏州、上海、宁波教会中学的毕业生开始在育英书院注册。这些具有基督教背景的学生比来自非基督教徒的富有家庭的所谓不正规学生更受欢迎。

秋天，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维呢(Wayne)的短期教师格福德先生(E. W. K. Gifford)加入到教员队伍中。即使有了他的帮助，裘德生和王令赓还是觉得教学任务繁重，平均每天不得不上四个或五个小时的课，而且还要处理行政事务。每位教师都不得不跨多门学科，正如王令赓所写道的：“我们已给快班学生复习了半部《创世纪》和全部《出埃及记》，我还要教教世教义、有机、无机和分析化学、通史、数学、英语”。另一年他又增加一门政治经济学课程。裘德生先生的课程表包括一年的代数、圣经、生理、物理和动物学。每位教员都要抽时间做些必要的翻译工作；裘德生翻译欧沃顿(Overton)的《应用生理学》，而王令赓则翻译国际主日学校课程笔记。裘德生夫人和王令赓夫人都投入了大量时间讲授圣经和英语，裘德生夫人还长期讲授音乐课。她在报告中曾特别提到“李培恩(Lee Ba-en)是一个为教堂弹风琴的学生”，“方桐生领着孩子们唱歌，并使他们合上节拍”。关于格福德，王令赓写道：“格福德的演讲课和音乐课深受学生欢迎，他

也引导学生打很难学的草地网球,这对他们的娱乐和身体健康都大有好处。”

义和团运动平息以后,1898年光绪皇帝一度推行改革所体现出的进步因素再次在帝国中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对西学的需求迅猛增加,1904年书院举办的一系列关于科学和普通课程的演讲,参加者都很多。演讲者是潘慎文博士(A. P. Parker)、李提摩太博士、费佩德牧师(Rev. Robert F. Fitch)和其他学者。那年,书院一名学生乡试中了秀才,大体相当于文学士,这对书院是个了不起的荣誉。但第二年即1905年,政府自1900年开始的教育改革达到高潮,废除了科举考试,而代之以科学、数学和其他现代课程。

在这不平凡的一年,育英书院发现自身已处于改革浪潮之颠,这场改革已横扫全国。秋天,裘德生先生休完假返校,带回了新的科学设备,包括X光机的全部装备、无线电报、引擎、气压计、显微镜和其他小型设备。周懋功也从国外旅行归来。他不仅负责在圣路易斯世界展览会的中国展览,而且陪同参加了在比利时万国博览会的中国展览。最后,对科学有长远眼光的马尔济(Arthur W. March, 伍斯特大学物理学学士)来校任教,他与学校的合作持续了四十年。李昂夫人(Mrs. Mandana E. Lyon)也来校教英语和绘画。

全校注册学生慢慢增长到115人,其中大学有35人,中学有80人。大学每级毕业生从4至7人不等。

购买二龙头

在1906年华中差会年会上成立了大学董事会。杭州、苏州、上海、宁波布道站各出一人,大学教员出一人,组成董事会。1906年11月董事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裘德生牧师当选为学校校长,任期一年,新校园计划也全票通过。因为育英书院是这个有二千二百万人口大省唯一的高等教育机构,它决定把校园迁到城外去,在那里可以以很低的价格买到大片土地扩建学校。董事会任命了一个教职员委员会负责购买地皮。

在考虑了城里及西湖边的几个地点之后,委员会最后选中了钱塘江边的一块地皮。王令糜描述了发现这块地皮的经过:“最后,我们被领向钱塘江,经过六和塔,我们发现了坟地中有一块相对空闲的土地,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这儿有一块离河面75尺高的悬崖。从钱塘江后退一段距离就是一块平地,高度渐趋升高至200英尺。周懋功在闸口(Zakow)王洋泉先生的帮助下做了调查,并在一个月内买下了250亩地(相当于40英亩)。从那以后,又以每亩5墨元的低廉价格购得另外150亩地,这块地离城墙约6英里。当地一条从外国租界孔增桥到南星桥的铁路就要竣工,南星桥有轮渡。这条铁路将把我们带进离校园2英里远的地方。(注:后来铁路终点站移至闸口,离校园1英里)我们拍了一些照片送给在美国的费佩得先生,用于为学校筹款。”

2.5美元
拱宸桥?

差会中有两人在休假——费佩得和巴包(Frank W. Bible)——他们被指派在美国为学校新建筑和设备筹款。这两人都把很多时间投入到这项重要而且艰难的任务中。从下列名单中募捐的钱、木材和其他物品,价值达16 800美元,他们是: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塞沃伦斯先生(Louis H. Severance);宾夕法尼亚州的维勒夫妇(N. P. Wheeler);纽约泡特威尔的维勒夫妇(W. E. Wheeler)和杜森伯瑞夫妇(E. G. Dusenbury);旧金山的道勒上尉(Robert Dollar)。从其他渠道又筹得17 000美元来保证新建筑的成功。那时,甘卜夫妇(David B. Gamble)正在杭州访问,对大学非常感兴趣,捐助了7 500美元来建一座新宿舍。

1908年2月,费佩得夫妇休完假返回杭州,加入了教员队伍,任课很多,还骑着马走出城里6英里远的新校址察看地基。那里种上了将近四千棵桃树和梅树,希望“这个果园成为一群孩子将来自立的良好基础,能有一个好的收成”。后来,在校园四周低洼地带又种植了一片茶树,在一块叫“三龙头”(San Lung T'ou)的西部斜坡上种了一片竹子,这两种植物的收益都比果树或出售山坡未开发地的草和灌木的收益大。

1910年,在费佩得的监督下,做了大量平整土地的工作,为在龙山的校园建设做准备。9月,签订了建筑合同,整个冬季,费佩得经常去校园监督主楼的建筑,主楼叫慎思堂(Severance Hall),用于行政办公和教室。主楼两边各建一幢宿舍——东边的叫甘卜堂(Gamble Hall),

西边的叫惠得堂(Wheeler and Dusenbury Hall)。上面的山脊上盖了五幢教员宿舍。每个星期天,费佩得先生由三个学生陪同,从城里走很远的路去新校园,为400名石匠、木匠和其他工人主持祈祷,讲解圣经。

1911年新年,基本建设工程已经完成,二月份是搬迁到二龙头新校园的盛大日子。大学的中文名字是之江学堂。之江、钱塘江都是浙江的别名,浙江省由此而得名。

之江学堂成为一个联合机构

在华长老会机构的联合问题已经考虑多年了。早在1902年就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关于在华长老会联合的委员会会议,这个委员会做了很大努力,最终达成了联合,成立了杭州协和女子中学(Hangchow Union Girl's High School),之江学堂以及金陵神学院(Nanking Theological Seminary)。

1908年6月,由北长老会华中差会和南长老会华中差会共同指定了一个协调教育工作的委员会,经协商,通过了以下决议:

- 1,在教育方面加强合作和联合的时机已到。
- 2,之江学堂及其各系应成为两个差会的联合大学,在对大学的控制和指导方面,两差会应该像在监督和日常开支方面一样,均平分担。
- 3,每个差会都应尽其最大能力帮助学校发展。学校

财产应按差会创建和维持学校投资的比例大小归属差会所有。

4, 每个差会应指定四名代表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 为实现联合制订计划; 商订自 1910 年春季学期开始联合。

一个代表两个差会的新董事会组成了, 叔美客(J. E. Shoemaker)、艾斯北(J. M. Espey)和巴包(F. W. Bible)代表北长老会, 司徒雷登(J. Leighton Stuart)、布林肯(J. Mercer Blain)和哈得逊(W. H. Hudson)代表南长老会。1909 年 11 月 6 日, 他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通过了重要的决议。裘德生再次当选为“下一年”的校长, 司徒华林(Warren H. Stuart)牧师(司徒雷登之弟, 译者注)被选为教授, 是教员中的第一位南长老会成员。下一年, 董事会通过了大学章程, 紧接着, 当地差会及在美国的资助母会就批准了。

第三章 在新校园(1911—1920)

1911 年最迫切的任务是让校园更整齐一些。还需做大量的工作, 才能让这块完全自然的土地变得更适合生活。土地还没有平整, 路要修, 要安装供水设施和电灯, 要建厨房和餐厅, 还有其他许多工作都需立即去做。

那时, 往往是在中国旧历新年之后才开始这一学年的工作, 一般是在二月份。1911 年 2 月 16、17 日两天举行考试, 18 日开始注册。在新校园的生活开始了, 共有 117 名学生报到, 其中 31 名是大学生, 86 名是中学生。这些学生中有 85 人是基督徒。王令贻先生当选为校长, 裘德生先生成为学校自助部的监督。教员由 12 名中外人士组成。

春季学期很成功地结束了, 秋季学期开学也很幸运。然而, 没过多久, 一场致命的疟疾袭击了学校; 全体学生都病得很厉害, 有 2 名学生死去。其中一位是学校年龄最大的, 是高年级班中最有希望的年青人。他来自基督徒家庭, 希望能做福音工作, 因为他看起来特别适合做这

上升……几个差会已联合起来投入到救济工作……伤寒和饥荒热病使形势更为可怕……说那段时间每天死几百人绝不是夸张。当地棺材都用光了,只好从临近的城镇运来。

“一旦从大动乱中恢复了秩序,政治与社会的变化对传教工作极为有利。新上任的官员对外国人表现出极大的热忱。1912年除夕之夜,省当局盛情招待了一个外国人团体。春天,这个外国人团体给新官员举行了一个招待会,其中几位官员对传教工作表示了非常友好的态度……”

秋季学期的一件大事是孙逸仙博士于1912年12月10日参观本校。在这个重大的日子里,王令赓校长写道:“孙博士受到了全校师生和大多数市民的热情欢迎。他为学生发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演讲。上海都督陈其美和浙江省民政厅屈先生陪同孙博士^①。合影以后,全体人员共进午餐。孙博士表示他非常感激传教士在他们所创办的学校里所做的工作,对我们这儿的蓬勃生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自助部

自助部的重建,引发了许多新问题。问题很严重,以至于好些年裘德生先生只得把工作搬到市里的差会商业

^① 屈先生是指屈文六先生,时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译者注。

一工作。这场严重的瘟疫对大学行政管理人员是一个警告,他们很早就认识到学校远离市区,难以得到医疗救助。因此,学校往往指定一名教员兼职负责学生的健康卫生。裘德生夫人、王令赓夫人、费佩得先生和马尔济先生都曾在过去数年不同的时期,不仅为学生,也不断为增长的教职工家属负责医护工作。大家都感到学校应该有一位专门负责医疗的职员,但从没任命过。几位重病号不得不移到城里的圣公会医院。

1911年的辛亥革命

1911年10月,正是瘟疫发生的中间,从武昌传来起义的消息,短短几个月后,一个历史新纪元开始了,中华民国成立,孙逸仙博士当选为临时大总统。

当消息传来时,学生兴奋不已。虽然所有的公立学校从革命开始一直到年终,几乎都关门停课,但之江学堂却弦歌不辍,直到年终。

关于杭州附近及学校周围在1911年秋天总的形势,可以在巴包的亲眼目睹中找到说明:“这一年是杭州历史上不平静的一年。在杭州实际发生革命的前三周里,这个城市的人们几乎陷入不可言说的恐慌之中;成千上万的人们逃离城市,害怕满清军队一旦受致攻击就会炸毁城市。然而,本省军队以最有秩序的方式推动当地的革命。后来,武昌爆发起义,人们忍受了自太平天国以来最严重的恐怖。成千上万的人数月没有工作可干;死亡率

学校(Mission Trade School)。王令赓向差会报告这个问题时如此写道：“去年新自助部的准备工作全靠裘德生先生一人承担，他全部时间都投入到它的开办和发展上。有600元拨款来弥补27名学生学费的亏空，这些学生利用这笔资助获得受教育的机会。除做服务和卫生工作外，他们堆木材，清扫地面，并计划做一些花木工作。”

“自助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董事会和差会应明确界定他们的政策以及自助部的目标。如果办一个花园式大学是董事会的意愿，那么就应有一名行政人员负责学校，这位行政人员完全支持发展成那样的学校，而且还是一名专家来实施此项计划。”

“为供养自助部的学生，有必要首先考虑与他们日常生活相关的每件事。教师授课的时间、学生背诵时间、福音练习时间、打扫清洗大厅、地板的时间都要包括在内，而且必须留出来。最严重的问题是让学生整个上午都留在教室里，以至于自助部很少有学生在下午有些空闲。这意味着其他人在寝室或教室监督他们。”

“……不管怎么说，有几个问题需要提出，必须解决政策和原则问题。自助的观念对通过高等教育而培养基督徒领袖的主要目标，是一个主要还是一个次要观念呢？教授商业或培养那些不去从事更高学术工作的穷孩子们，大学就是最好的地方吗？”

虽然自助部第一年的实验证明对大学日常生活干扰很大，但应该说，自助部吸引了许多孩子，如果没有自助部，这些孩子也许不会受到高等教育。第二年，申请者很

多，不得不将名额限制在50人。因为他们的学费已降到每年10元。那些学生付的学费，加上104名学生每人44元的正常学费收入，比他们的膳食费多出1400元。后来，有几届校友把自助观念在杭州付诸实践。

1913年，在裘德生夫妇在美休假期间，杭州的阿瑟先生(J. H. Arthur)来学校负责自助部。

人 员

综观之大历史，人员变动是经常的。事实上，在它作为基督教大学的这段时期内——50多年——只有9对西籍夫妇和1名未婚女士任职达10年或更长时间。23位个人或夫妇只有1年，有11位有2年，7位有3年，2位有5年，还有1位有9年。那些常年在此执教的人员在7年末可享受一次带薪假期。有时候这个假期可延长用于深造或劝募工作。这些人休假时必须找人替换工作。

在新校园的早些年，作为教师骨干的西籍人士有裘德生夫妇、王令赓夫妇、马尔济夫妇、费佩德夫妇及司徒华林夫妇。从1913年就任副校长的费佩德在1915年辞职到了杭州联合布道会(The Union Evangelistic Committee)。1922年他又返回就任校长。

1916年秋天，弗兰克·司格特牧师夫妇(Rev. and Mrs. Frank D. Scott)来到学校，司格特毕业于宾夕法尼亚的威尼斯伯格学院(Waynesburg College)和奥伯恩神

学院(Auburn Theological Seminary)。他教授社会学,深受学生欢迎,但在1920年,司格特辞职返回美国。瑞纳德·维勒牧师夫妇(Rev. and Mrs. W. Reginald Wheeler)曾在南京进修语言及在美国为学校募捐,一年之后即1916年12月来到学校。维勒先生是耶鲁大学和奥伯恩神学院的毕业生,他教授圣经和英语。他在校任职期间写了两本书:《战争诗集》(*A Book of Verse of the Great War*)和《中国与世界大战》(*China and the World War*)。

在司格特夫妇和维勒夫妇来校的同一年,两位由维勒先生付薪的短期教员来校。他们是瑞得学院(Reed College)的毕业生罗兰·布瑞陶(Roland C. Bristol);西方学院的毕业生保罗·可可派瑞克(Paul H. Kirkpatrick)。前一位呆了一年,后一位呆了两年,他的弟弟布鲁斯(W. Bruce Kirkpatrick)也来了,但只呆了一学期。这两个年青人帮助教授英语和体育。弗兰克·巴包(Frank E. Bible)先生是董事巴包牧师(Rev. Frank W. Bible)的父亲,从1915年至1918年教授历史和政治经济学。

1918年5月,由于维勒夫人患了重病,夫妇不得不返回美国,有人担心他们不会再回来了,但经过良好的医治,维勒夫人身体完全康复,可以在秋季返回。但在1919年春季学期末,维勒夫人由于健康原因必须立即返回美国,再次休假,这次没有任何希望他们能再回中国。因此,在9月份差会调派在宁波的队克勋夫妇来校接替维勒夫妇的位置。队克勋毕业于汉密尔顿学院(Hamil-

ton College)和旧金山神学院(San Francisco Theological Seminary);队克勋夫人毕业于西方学院(Western College)。在接下来的学期,队克勋夫妇被任命为大学正式教员,一干就是30多年。队克勋教授圣经、英语,需要时他也教哲学和宗教比较研究,队克勋夫人任图书管理员,也教授英语和音乐。

1919年,另一位美国新教员来到学校,巴克曼牧师(Rev. Charles P. Barkman),他在伊利诺斯大学和旧金山神学院毕业后来这儿教历史和英语。巴克曼夫人1922年也来到这儿,她是一名护士,负责学校医疗诊所,也在英语系教课。1926年,巴克曼夫妇离开学校。这时他在杭州有时间出版了他的著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中国学生专用》(*A History of World War I - for Chinese Student*)。

学校在新校园开始工作时,中国教职员有周懋功先生(M. K. Chow),任教务长和圣经老师;李升堂先生(S. D. Lee)教天文学、化学、三角学和福音;韦早星先生(音译,Wei Zao-tsen)教英语;还有向文达先生(音译, Tsiang Ven-dah)和包先生(D. Y. Pao)。韦先生第二年去南京研究神学;包先生在同年也离开学校,去宁波做了一所新学校校长。陈明恩先生(M. U. Zung)接替了韦先生的位置,他是密西西比米尔斯皮斯学院(Millsaps College)毕业生。他教英语,热衷于体育。1915年周懋功和家人离开学校去纽约怀特圣经学校(White Bible School)学习,丁恺丰先生(Tin Kai-fong)接替了他的位置,丁是

1897年的毕业生,曾在协合女子中学任首席中文教师。

校园素描

“龙山”是众多山丘朝南的一只巨大马蹄状的手臂,朝东方展开,象一块巨大磁铁把西湖和城市吸进她环抱的臂膀中。在南面,这些山呈扇状展开五座山脊,延伸到钱塘江北岸。你从东沿着河堤走,经过六和塔,它高高地建在蜿蜒起伏的第一个山脊上;接下去你就到了叫“龙头”的悬崖,这儿建了第一批三位中国教员宿舍,后来又建了几座。正下方是一个天然梯状剧场,叫“下龙头”,这里为小学所在地,后来又建了一座小型宿舍、机械车间和铸造工厂。

一条很深的峡谷把宽广的悬崖切割出一块地方叫“二龙头”,学校主要建筑都在这里。沿着这条峡谷,你就来到高高低低的蓄水池,这儿供给全校用水。一座高高架起的天桥连接着这两座“龙头”,并架起一根水管通向龙头头的房舍。在学校建筑上面有五座原先建造的宿舍,一个比一个地势高,最上面是一座天文台,建在通向山峰的山脊的半路上。

“三龙头”在学校西侧,这里建有更多的宿舍,还有一片茶园和竹园。它与“二龙头”之间有一道狭谷穿过,这儿有体育馆、体育教学楼和露天游泳池,最后面是操场。第五道山脊在大西边,不属本校所有,有一座大的私人住宅,这些年学校把它租下用作教师和工人的宿舍。

买下校园后的四十年里,树木繁盛,覆盖了大部分不用来建筑的空地,为鸟类和其他野生动物包括狐狸、眼镜蛇、野兔和鹿等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实际上,各国旅行者已把本校园列为全世界最美的风景之一。从山上俯瞰下去,钱塘江从白雪覆盖的山上蜿蜒冲向西南,很象在罗伯特大学俯瞰海尔斯旁特(Hellespont),或象凯于格湖上(Cayuga Lake)的康乃尔大学。当你在春分或秋分眺望钱塘江时,你也许会看见著名的“钱塘潮”掠过江河,逐渐形成白色的泡沫,再撞到对岸破碎。杭州湾逐渐变窄,延伸大约三十英里,直到钱塘江口。海潮暂时被沙坝拦住,最后涨成高达十到十五英尺高的水墙,接着以令人震撼的速度挟带着浪头冲向三角洲。这种力量直到它经过六和塔时才耗尽,兴建六和塔即是为了消除“潮中龙”(Dragon-in-the Tide)这一灾害。

校园初具规模

为调查和指导学校的建设工作,1911年贝克先生(Henry. E. Baker)从汉口一家官办造纸厂来到杭州。他是纽约沃特镇(Watertown)的一位工程师。他在学校两年期间做了许多工作。

除上面已经提到的学校三座大砖瓦楼外,1910年学校还建成了五座宿舍楼,分别是王令康夫妇居住的北太平洋楼(North Pacific Residence),费佩得夫妇(后来是马尔济夫妇)居住的罗彻斯特楼(Rochester Residence),裘

德生夫妇居住的康沃斯楼(Converse Residence),司徒华林夫妇居的南长老会楼,还有周懋功夫夫妇居住的帕斯顿楼(Paxton Memorial Residence)。幸运的是,南长老会捐赠的3 800元购买了“头龙头”,使校园东扩成为可能。这座山的三座供中国教员居住的宿舍是由纽约罗彻斯特第一长老会捐建的。

到1912年春天,校园已有很多人定居,荒野逐渐被开垦,种上了树木和灌木,草坪也修葺一新,校园变得很有层次,也很饱满。来自芝加哥的迈可考麦可夫人(Mrs. Cyrus H. Mc Cormick)设计的供水系统非常成功,该系统扩展到上面高处的蓄水池,可供应清澈的山泉水给这座山上的建筑,白铁管代替了竹管子。下面低处水池依赖泉水蓄水,加上上面引下来的水,足以供应学校所有主要建筑物和头龙头山的房子。

一座天文台建在山巅,1912年完工。它被称作费城观象台,因为它是由费城的特纳夫人(Mrs. Charles P. Turner)捐献1 000元建成的。

都克堂(the Tooker Memorial Chapel)是由新泽西州东奥瑞治(East Orange)都克(Nathaniel Tooker)一家人捐献的。建筑工作是由威尔逊先生(Mr. J. W. Wilson)负责完成的,他于1914年贝克先生走后做了一名教员。1917年6月20日,全校师生及校友、客人300人出席了都克堂的奠基仪式,由杭州的臧牧师(P. K. Tsang)安放基石。这是一座很漂亮的石构造教堂,座落于校园中心附近,1919年1月11日竣工,作为学校生活中心的基

象征,它一直矗立在那里。

另外两项在“三龙头”的建筑完工于1918年或1919年春天,包括给威尔逊一家居住的卡特楼(Carter Memorial Residence)。这座房子经费来源主要是由迈可考麦可夫人捐赠的5 000元,还有维勒邦格楼(Wheeler Bungalow),由维勒夫妇居住(W. R. Wheeler)。这座楼经费来源于维勒先生捐助的3 000元,和他在费吉尼亚州的父母尼尔逊夫妇(Nelson P. Wheeler)捐助的4 000元。

更多的捐赠滚滚而来

除了上文提到的捐赠,学校还很幸运地收到塞沃伦斯先生(Louis H. Severance)捐赠的5 500元,用来建造慎思堂(Severance Hall)——学校行政与教学楼。甘卜夫妇(D. B. Gamble)慷慨地为一座宿舍顺利完工追加了4 500元,这座宿舍命名为甘卜堂。道勒上尉(Robert Dollar)是道勒轮船公司的头头,给自助部捐献了约900元的木材。曾国藩的孙子为图书馆捐献了几千卷有价值的历史、政治中文书。北京的岳维京先生(音译, Yue Wai-Ching)捐赠1 000元购买科学仪器。

由于维勒先生的劝募,收到捐献达4 000元:甘卜夫妇2 500元;加州柏克利的维勒先生(W. M. Wheeler)1 000元,还有500元来自其他捐献者。这些资金分别作如下用途:1 000元用于校园美化;1 000元用于装电灯;500元用于图书馆购买书籍;1 500元用于修建一个运动

场。运动场的捐献者之一是威治尼先生(Mr. Bleeker Van Wagenen),但运动场根据主要捐献者的名字而命名为甘卜运动场。王令赓先生对运动场有如下描述:“运动场由一块稻田改建而来,位于一个伸向河岸的山谷之中,作为一块天然圆形运动场,它为学校目前体育运动提供了宽广的场地,当计划中的看台完工之时,运动场就会给运动迷们提供最宽敞、最有吸引力的娱乐场地。”^①

1913年,瑞根纳得·维勒先生(Reginald Wheeler)因为夫人健康原因回到美国,使他能在美国南部投入大量时间,为大学募捐。9月,在田纳西州的纳什威尔,他遇见美国长老会海外差传委员会的执行干事,他不仅授权给维勒先生,而且还帮助他在南长老会教区发起了一个20 000美元的募捐。他描述了学校是如何急需经费,说得十分动人,因此到第二年7月,委员会报告已收到募捐10 000美元,已划给纳什威尔的司库。

也是在维勒的努力下,在美国成立了之江学堂顾问委员会,斯皮尔博士(Dr. Robert E. Speer)任主席,普莱特(Dr. Charles H. Pratt)任副主席,还有其他十四位成员,有七位成员分别代表各自差会。

司徒华林当选为校长

当1916年秋天司徒华林成为代理校长时,他面临的

^① 《之江潮声》(The Tide),1924年,第8页。

学校内部发展的任务并不轻松,但他在六年行政任职期间取得了很大成绩。他建立了很强的教职员队伍,赢得了中国团体和校友的支持,改进了课程,培养了教会。董事会已从六名成员扩大到九名,允许有三名中国成员参加,分别从杭州、苏州和宁绍(宁波、绍兴)的长老会中选出一人。司徒华林认为北长老会与南长老会应联合起来,选出他们的代表担任董事。他向1916年2月刚组建的校友会做宣传,建议成立地区组织,并请求校友捐献以推动学校发展计划。校友对他的建议作出了反应,在中国不同口岸城市建立分会,甚至在东京也成立了有十六位成员的校友会。为加强校友的忠诚和提高有培养前途的学生的兴趣,学校在1918年5月新出版了一期特别的文学杂志《之江潮声》(因著名的钱塘潮而得名),分发给大学的所有朋友。这本杂志也就成为以后一系列大学年刊的开端。

司徒校长很早就着手增加学校收入,把每年学费从80元提高到90元。这个数目包含了学费和食宿。在1917—1918年的预算中,一个学生每月的食宿费估计为3.6元。中国教员的薪水每月从60到20元不等。在所有开支中,除了西籍教员的工资是由他们各自差会支付外,两笔最大的开支是学生的食宿费6 840元和中國教员的薪水7 200元。预科班(现以之江大学附中而闻名)有10名学生获奖学金,“给牧师、教会人员和非基督徒的孩子”。六所教会附中小学校都可获得30元的新生助学金。

宗教生活

校园里的宗教生活一直正常维持着,即使在辛亥革命期间也未曾中断。司徒校长和韦早星先生与36名学生一道深入到山上的许多乡村去传福音。基督教青年会学校邀请杭州各教会的牧师在主日晚会演讲。南长老会第一位被按立的陈达三牧师(音译, Rev. DzenDah-san)和山东长老会的丁立美牧师各自进行了一周的聚会和个人布道,这加深了基督徒的灵性生活,影响着其他人对基督信仰的渴求。

1912年7月,有两个会议在学校举行。一个基督教青年会江南地区大学生会议第八年年会。有二十家教育机构出席会议,有100名代表和发言者。另一个是浙江省牧师及教会同工学校第一次会议,有119人报到,在这个校园同时举行的这两次会议共有300名客人。在到会发言的人中,下列人士特别值得提一下:盖瑞特博士(Dr. J. C. Garritt)和普拉斯博士(Dr. P. F. Price),这两位都是金陵协和神学院的;伦敦会的包克斯牧师(Rev. Box)和迈尔派斯牧师(Rev. Malpas);上海青年会的布莱克曼先生(Mr. Fletcher Brockman)以及上一年曾来校参观的布道家丁立美牧师。

1912年秋天,在王令赓牧师的支持下,作为杭州长老会下属的大学教会成立,周懋功和李升堂是第一任长老,有89名会众,他们大部分是本校教师和学生,但也有

一些工人、仆人以及附近村庄的百姓。

在1916年长老会中国中部差会的年会上,大学董事会的代表呼吁差会要重视这样一个事实:174名学生中只有44名来自基督徒家庭,只有27名来自长老会中学。大学董事会代表催促差会对此种情形给予充分关注。

不久以后,艾迪(G. Sherwood Eddy)主持的一系列特别会议通过了为上帝服役的五十个决议,这为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这些决议表明,大学在争取非教徒学生入教方面能够成为一个福音机构。在丁恺丰做长老和马尔济、徐僧党(音译, Dzu Sen-dang)做执事时,大学教会的工作得到了加强。在马尔济的领导下,乡村福音工作队乘坐着“苏三·戴德瑞克”(Susan Deaderick)号游艇定期巡回布道,这只小游艇是1912年温斯顿-萨勒姆(Winston-Salem)的格莱恩夫人(Mrs. R. B. Glenn)捐赠的。

在来自上海的江长川牧师(Z. T. Kaung)主持的一系列会议结束时,大学十年来的宗教生活达到了最辉煌的顶点,49名学生公开宣布他们信仰基督,23名学生受洗。对此,司徒华林校长写道:“这是我亲眼见到的最令人心慰的一幕情景。”

学生活动

学生除了上面描述的宗教生活外还有其他活动。他们成立了文学社,用英语和中文进行演讲、朗诵比赛。

1919年3月27日,在王令庾先生的指导下,杭州举办了第一次校际辩论赛。戏剧深受大家欢迎,他们排练了好几幕戏剧。

学生组织了体育队,有足球队、篮球队、羽毛球队和径赛队,在校内外引起人们很大兴趣,在1918年3月11日甘卜体育馆(Gamble Stadium)举行的华东大学生田径运动会上一举夺魁。大学从上海一废弃的划艇俱乐部买回三只赛艇,自嘲可能是教会大学中唯一的一支大学代表队,但由于缺乏竞争对手,这项运动很快就沉寂了。

1919年秋季学期的工作让学联(Student Union)给打断了,学联是由公立和私立学校的学生组成,它要求学生应走出校门,向城市和乡村的人们宣讲爱国主义。学生在圣诞节前后罢课,目的是要求政府对日本侵占华北采取更强硬措施。学生还对省长的公告表示抗议,该公告要求学生集中精力学习,不要干涉政治。

课程 改革

1912年,学校在课程上做了一些改进,所有的英语课每周增加三个小时,初学者除外,历史、地理、逻辑和政治经济学用英语教学。仍用中文教学的课程有天文学、圣经、生物、化学、经学、地质学、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和三角学。

增加用英语教学的课程这件事在1914年9月长老会中部差会的会议上引起了认真的讨论。差会驻大学董

事会代表报告说:“关于大学委员会要求教员‘更多使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建议,董事会采取了此建议,这引起了对此问题的争论,除了中国文学外,大学课程是用英语还是用中文来教学意见不一。”

经过漫长的讨论,差会最终决定同意加强英语教学,“充分地给那些学英语的学生以实际有效的语言练习,但我们认为大学也应尽可能地使用中文作为教学语言,因此,学生的中文素养不会受到影响。”这件事反映出遥控系统是如何经常妨碍大学的进步。大学的每项政策都不得不由学校董事会、两家差会、在上海的北长老会中国委员会,最后是两个差会董事会及在美国的托事会一一审议。

1917到1918学年,大学第一次实行五年制课程(初级二年,高级三年)。包括一些新课程,如绘画、教育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心理学和高等物理。

司徒校长在总结大学第一个十年的工作时说:“68名学生已经毕业,11人从事教牧工作,32人教学,13人经商或在政府任职,7人在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或从事基督教其他工作,3人是工程师,1人是医生,1人从事文学。”

1914年,两家差会和大学董事会一致通过决议,将学校名称从杭州长老会学院(Hangchow Presbyterian College,中文名称为育英书院)改为杭州基督教学院(Hangchow Christian College),中文叫之江大学。

第四章 为保持高等学校而奋斗

长期以来困扰之江大学的问题是,它是否应发展成一个全面的高等学校(fullfledged college)。1919年11月,北长老会干事司格特(George T. Scott)和斯凯尔(William P. Schell)夫妇访问了之大。他们带来了有关长老会对大学投资兴趣的报告和扩展计划。但在私下谈话时,司格特表示他个人认为之大应对大专(或译为初级学院(Junior College)的现状表示满意。

全校教员对此看法并不赞同,因为他们早已着手开展本科课程的教学计划。1920年3月,全校教员通过了如下决议:“继续发展成为一个本科学校的合理性问题已提出来了。我们要求董事会考虑之大继续发展成一个本科学校的所有可能性。”

司徒华林校长使之大获准立案

依据这个请求,董事会要求司徒华林校长去美国募集资金,如有可能,还要使大学在美国立案。他在美国谈

问了四个半月,五个主要目标都达到了。分别是:激发起差会和差会董事会、尤其是南长老会的兴趣;招聘两名新教员;募集更多资金;在哥伦比亚立案;与顾问委员会建立更密切的联系。

1920年11月,差全会董事会批准了之江大学根据哥伦比亚法律进行立案,并指定它的代表同时担任法人和托事,这在之大历史上是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南长老会的代表是柴斯特博士(Dr. Samuel H. Chester)、史密斯牧师(Rev. Egbert W. Smith)和瑞维斯牧师(Rev. Joseph C. Reavis);北长老会的代表是西乐博士(Dr. Thomas H. P. Sailer)、队莱特先生(Dwight H. Day)和司格特先生(George T. Scott)。不久以后,又加上下列几位人士:南长老会的威尔斯先生(Edwin F. Wills)(与德威特先生轮流担任);北长老会的斯皮尔博士(Dr. Robert E. Speer,与维勒先生轮流担任)。

1920年11月26日,之江大学立案许可状写好并盖印,1921年2月5日之大托事在华盛顿召开第一次会议,此次会议最后通过了有关立案和组织章程的一系列文件,关于立案的第三个文件列举了应开设课程:天文学、生物学、化学、中国语言与文学、数学、现代欧洲语言、哲学、物理学、宗教学、社会学。关于组织章程的第十个文件声明:“完成了预定学习课程的学生可获得文凭。完成全部大学课程的毕业生可获得适当的学位。”

尽管之大已立案,但从四面八方来的压力使之大仍旧是个两年制的大专学院,因此司徒华林校长在1921—

1922 年度报告中说之大实际上处于“危险的境地”。1921 年教育委员会(通常按该委员会主席的名字称为伯顿委员会)来华,建议华东的基督教教育机构应模仿伦敦大学,合并为“华东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China)。这包括上海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之江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神学院。

关于长江下游地区教会学校联合的类似建议最早可上溯到 1914 年 2 月 15 日,这天王令赓博士和席勒斯巴博士(Dr. J. A. Silsby, 上海清心书院校长)向华中差会递交了一份备忘录,除了别的事情以外,还建议东吴大学、上海浸会学院(即沪江大学)、之江大学与金陵大学在业务工作方面联合。但这个想法历经多年才产生。即使在伯顿委员会建议组建华东大学后,这一想法仍争论了许多年。

根据美国的立案章程,在 1922 年 6 月 17 日举行的毕业典礼上第一次颁发了学士学位,而且,学校还首次引进西方式的学位帽和礼服。这是司徒华林校长掌校以来的最后一次毕业典礼。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孔宁海姆(E. C. Cunningham)作了演讲。两位年轻人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一位是顾敦,留校作了附中国文教员;另一位是周楚新(音译,Chou Chu-hsin),进了政府海关。

校友助一臂之力

在这关键时刻,校友开始更强有力地推动学校,使之

保持为一所本科大学。下面所列的是五年制大学的课程:9 门国文课程;7 门生物学课程;4 门化学课程;5 门教育学课程;13 门英文课程;2 门地理课程;8 门数学课程;7 门物理学课程;5 门其他西语课程(2 门法语,2 门德语,1 门希腊语);2 门西方哲学课程。校友们认为必须保持这一标准,因为没有课时可以减少,只能增加。

校友们一系列明智的举动很快使董事会成员从 9 名增加到 15 名;3 人来自长老会(杭州、苏州、宁波);6 人分别来自两个合作差会(差会中须有 1 人是教职员);2 人来自校友会;3 名由董事会推举的教育家,参与董事会事务,任期三年;大学校长(选举产生)。和以前相比,这一新的安排给了校友和教职工在董事会里更多的发言权。在 1922 年 2 月的年会上,扩大了的董事会通过了一项提议:同意保留大专和本科学制。董事会还通过了之大成为华东基督教大学联合会成员的决议。在同一个会议上,董事会接受了司徒华林校长的辞呈,选费佩德为第四任校长。但费佩德回美国募集资金,他在美期间由王令赓代理校长之职。这段时间居然长达四年。小埃文斯(Edward Evans Jr.)被选为司库,一直在校服务,直到 1927 年离开。

1923 年,葛得基博士(Dr. Earl H. Cressy, 新教组织华东基督教教育会和高等教育委员会干事)和华勒斯博士(Dr. E. E. Wallace, 中华教育会副干事)合写的关于之大的一篇送给董事会的报告表明,之大需要更多的支持。考福德博士(Dr. O. C. Crawford, 华中差会执行干事)写

了一封措词很强硬的信,促使大学扩展本科工作。这些要求给在纽约和纳什威尔的高层领导以很大压力。一方面由于这些建议,另一方面也由于费佩得强有力的宣传和私下的说服工作,董事会批准之大扩充的障碍最终消除了——1924年6月17日费佩得非常高兴地通过电报向王令庾报告了这一消息。

1926年春天的一件大事是,5月15日在都克堂举行了费佩得博士的就职典礼,他是之大第四任校长,华东各院校校长和其他名流出席了典礼。这是本校曾经历的最令人骄傲、最令人激动的事情之一。虽然费佩得自1922年就当选为校长,但由于他长期在国外,就职仪式一直拖至今日。

建筑部

参加费佩德校长就职典礼的客人们注意到佩韦斋(Wilson Hall)的墙体已竣工一半,在体育场附近峡谷的下方,路丝威勒体育馆(Louisville Gymnasium)的地基已打好了。从1920年起,之江大学建筑部一直由威尔逊先生(J. Morrison Wilson)负责,由杜僧党(音译,Dzu Seng-dang)先生和十三位绘图员协助工作。[在第一年他们就设计并监理了差会和金陵大学建筑,价值分别为20万元和30万元。第二年,这个部建筑产值达674 000元,一份五年来的工作报告显示,建筑部设计了75座建筑,承建其中的63座,产值达1 200 000元,利润为43 000元。

除掉运转费用,建筑部上交大学20 000元现金,3 100元的材料,460元的利息,750元的设备。]佩韦斋(教员宿舍,后用于女生宿舍)花费20 000元,以捐献者Wilson先生的名字命名是再合适不过,科学馆、体育馆、图书馆、宿舍和一处中国单身教员宿舍也是建筑部设计的,仅此一项就为大学节约了9 000元,这些建筑工程早被公认为大学对华东现代生活的贡献的一部分。

在完成单身宿舍楼和体育馆的规划并开始动工之后,威尔逊先生关闭了建筑部,和家人一起去了上海,在那里,他加入了一家建筑公司。但他和他的主要工程师杜僧党一直监理这两座建筑的施工,直到1926年竣工。建筑部的建筑工程特征不断丧失,直至1929年,这时,在徐教授(Ruf Shu)的精心计划下,随着工程系的扩充,建筑部又有了生机。

人事异动

1920年,马尔济休假,艾利逊牧师及夫人(Rev. and Mrs. Andrew Allison)从江阴来到生物系服务一年。艾文斯夫妇(Edward Evans)、小史密斯先生作为南长老会的新聘人员来校工作,葛顿(Hugh H. Creighton)也作为西方学院(Occidental College)的代表到达此地。第二年秋(1921年),来自华盛顿李大学(Lee University)的夏课勤(James L. Howe, Jr.)来校任化学系主任,从1921年服务到1924年,再从1927年服务到1933年。

1922—1923年开始了一般性的教员变动：司徒华林博士及夫人回国休假；罗天利夫妇(Roy S. Lautenschlager)来校教社会科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他们都是密西根大学硕士毕业；鲁继曾(Paul C. C. Lu)来这儿教教育学；李升堂先生(S. D. Lee)从北京学习归来，继续教化学。新任教务长是吴维德牧师(Rev. Andrew V. Wu)，他1912年毕业于之江学堂，1916年毕业于伍斯特学院(College of Wooster)，曾任青年会驻法国中国劳工团干事，后又毕业于普林斯顿神学院。他把深邃的智慧与浓厚的宗教热情紧密结合起来，使他在那些困难年月处于不败之地，他把这一作风带到了新岗位。

1925年，钟钟山(Chung Chung-shan)应邀担任国文教授，正如我们后来看到的，这是他最幸福的选择。随着舒鸿(Thomas Su Voong)的到来，体育文化和器材运动有了生机，他曾在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接受培训。蒲顿牧师及夫人(Rev. and Mrs. Dyke Van Putten)和郭礼赅牧师及夫人(Rev. and Mrs. Augus R. Craig)上一年曾在北京语言学校学习，现在和其他几位新教员分在历史、哲学系。

1926年秋天来了新教员，包括毕范宇牧师(Rev. Frank W. Price)和夫人埃西(Essie)，他来自华中差会，负责宗教教育系。在王揆生先生(Wang Kuei-sheng)的帮助下，他开辟了新的乡村服务中心，学生可在那里做一些祈祷和社会工作。沃克先生(Donald W. Walker)先生在美国深造六个月之后返回学校，重新教起他的英语课，他

深受学生欢迎，因为他在学生们的文学和体育组织中表现非常活跃。

新泽西州大西洋城的梁乾社先生(George Kin Leung)来校教授中国戏剧，而他毕业于西方学院的妹妹则担任了校长秘书。梁小姐离开后，夏课勤夫人接任她的职位，从1927年到1933年，她连任费佩德校长、李(培恩)校长、明思德校长(Mc Mullen)秘书。塞尔孟先生(R. J. Salmon)是从圣公会借调来的，在化学系任教一年，和考克斯(Warren M. Cox)在一起工作，考克斯是在1924—1927年任化学系主任，这种安排是期望之大为梅恩博士(D. Duncan Main)的医学院培养医前期学生，梅恩博士医学院与在杭州的圣公会广智(Kwang-chi)医院有联系。同时，蒙特哥莫瑞先生(R. Paul Montgomery)再次来校教授一年的英语和音乐。1926年佩韦高竣工，可为16人提供住宿，这不仅可以让几位年轻的外国教员住进去，就连许多中国教员也可得到照顾，他们不必每日乘汽车或黄包车在崎岖不平的新公路上来回跑了，学校距杭州这段路程有五英里远。

宗教与社会生活

平常年份如1922—1923年，学校宗教生活主要是每周的礼拜和祈祷聚会，再就是走出去到附近乡村的一些其他活动。学生志愿队是在发誓献身传教事业很严格的基础上重新组建的，招聘了八名大学生、两名中学生作为

积极分子。校友朱新僧(音译, Chu Sin - sen)是苏州一个长老会的牧师,发起了宗教强化周活动,在结束时,三十名学生公开表明了他们对上帝的信仰。11月,艾迪(Sherwood Eddy)和琼(E. Stanley Jones)主持了三次集会,四十四名学生公开了他们的信仰,在那一年,其他著名访问者都对学生发表了演讲:普林斯顿的厄得曼博士(Charles R. Erdman),学生志愿运动的威尔得博士(Robert. P. Wider),“新时代运动”(New Era Movement)的福尔柯博士(Dr. Hiram J. Foulkes),日本的古利克博士(Dr. Sidney Gulick),他们每人都提出了基督教的普世特点和影响的新概念,这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述人士和其他人的启发下,学生们按照新章程重新组织了“学生自治会”,并通过实践认识到,自治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它既包括自由和自决的权利,也包括责任和义务。他们以办报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心声,他们创办了两期中文简报和一期英文简报,使学校与校友及其他朋友联系更紧密,也使学生的文学才华崭露头角。他们还成立了辩论会,一年之中举行了两场校际辩论赛。第一场是12月在杭州举行,东道主战胜客队圣约翰队,辩论题目是“选举权应该不应该扩大到妇女”。最后一场辩论在上海举行,之大队输给了沪江大学队,辩论题目是“战争不再是正义的了吗?”。

随着体育会的成立,学生对运动有了新的兴趣,在各种比赛中表现极佳,不仅在附属中学之间的比赛中获得冠军,而且也在浙江省的田径运动会上夺得冠军。之大

足球队和篮球队还出征与华东的一些大学队比赛。

1925—1926年王令赓博士休假时,队先生(Mr. Day)成为大学教会的代理牧师,正是在他的建议下,学校木匠何师傅当选为长老,这使教会会议更民主一些。那年,学生在志愿队、基督教复兴运动的努力(Christian Endeavor)、青年会的工作很忙碌,还参加其他宗教与社会活动,包括为工人新开的圣经班。陈(David L. Chen)还从乡村商店和居民中争取到资助,建一个闸口公益社(Zakow Community Center)。

逆风和战争乌云

从1924到1927年,大学经常受到席卷全国的政治动乱的影响,一部分原因是各路军阀都想通过国内战争控制全国,另一部分是排外骚乱和抵制洋货造成的。

1924年9月,身为福建军事首领的山东籍将军孙传芳进军浙江,攻陷了省会杭州,代替了对手卢永祥将军。王令赓在给华中差会的报告中描绘了这次入侵:“回顾这一时期的工作,我们不能不提到许多政治与社会的变化。9月,这里陷入了大混乱;恐慌的人们成千上万地拥向上海的外国租界寻求庇护。令事情更糟糕的是,从福建开始步入政界的孙传芳,开始向北京发展,指挥他的军队在25日攻占杭州(顺着我们校园前面的河路),就在这一年,西湖南岸的雷峰塔倒塌了,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战争持续进行了六周,上海、杭州、苏州之间的交通中断。

学校不能上课，聚会也被禁止，传教士能做的唯一工作是和红十字会一起救护伤员和难民。

“这年，人们的排外和非基督教的情绪上升。这种宣传似乎是激进的领导者、学生和政府中的某些教育工作者发起的。广东被认为是激进思想的温床；孙中山已逐渐成为广东的主要发言人，人们都说俄国苏维埃政府给他提供了资金支持。

“尽管发生政治动乱，大学仍有 258 人注册，一半以上是大学部。董事会批准发展本科教育，南长老会对学校兴趣增大，以及科学馆和体育馆将要建成的前景，对教职员和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对五卅事件的回应

1925 年是那时在中国的所有人都会牢牢记住的一个年份，因为那年发生了不幸的“五卅事件”。上海学生为抗议一家日本纱厂的监工杀死一名中国闹事者而示威。警察禁止租界内所有的游行和政治示威活动，一些学生因此而被捕。后来，到 5 月 30 日，学生和群众聚集到关押学生的地方，他们试图冲击监狱，警察为平息暴乱，朝群众开枪，杀死六人，其他一些人受伤，后来也死去。因为发令开枪的是一位英国警察，这些死难者成为烈士，排外思潮如烈火一样蔓延开来。这一事件激起了整个国家不可抑制的狂热，人们处于战争的边缘。那一个整个秋季，之江大学的学生如同其他地方的学生一样，处

于不安宁的状态。就在圣诞节期间，学联号召发起非基督教的运动。正像费佩得校长后来报告的那样，学校行政人员几乎不可能做很多的工作以使局面好转，他制订了计划来限制行政人员对教员的执行委员会所负的责任，原希望通过执行委员会，学校问题能得以迅速、有效地解决。

国民党的革命

1926 年秋季学期，之大开学时有 247 名学生注册，但他们的学习由于另外一场国内战争而被打乱了，到 12 月 24 日，所有学生都离校回家了。这场战争不同于以前的战争，那些战争往往是不同的军阀为控制北京政府或省的收税特权而互相倾轧。现在，孙中山在广东建立了政府，而且邀请了共产党作顾问和军事指挥员，广东政府的目的是把中国从长期的军阀统治中解放出来。由南方人组成的一支军队在蒋介石将军的领导下开始北伐。孙传芳将军，现已晋升为总司令，控制着包括浙江在内的五个省。如有可能，他准备挡住蒋介石的北进。圣诞节那天，孙传芳的部队赶到钱塘江的校园这一边，并挖掘壕沟。然后，他们在大学后面的山上布置了大炮，开始炮轰江对岸壕沟里同情南方的夏将军的部队。这样，校园成为战场。20 多万士兵在 1 月份越过大学阵地，他们没能挡住南方军队的进军。许多掉队士兵整日整夜徘徊在校园周围。1927 年 2 月 1 日，西籍

教员及家属都去了上海。

2月17日的夜晚是个恐怖之夜,北方军队撤退时大肆抢劫、焚烧城里的商店。到18日中午,蒋介石的军队开到杭州,恢复了秩序。人们张开双臂欢迎蒋介石的军队。他们代表国民党,而且人们急切地期望他们的到来,因为他们的宣传队许诺,如果让他们统治国家,那么中国就会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他们许诺降低物价,允许一切可以使国家繁荣昌盛的政策,尤其是要把口岸城市租界里的外国人驱逐出境,剥夺他们的治外法权。在南方军队到达时,民心已被争取过来了。

如果杭州的外籍教员知道同是南军的另一支部队进军南京并试图朝外籍人士开火,那么他们就不会怀着好奇心来讨好军队。是这样的,他们和一帮很年轻的南军军官们开始了交谈,士兵们正在大学运动场上开展巡逻,军官们在那里作短暂休息。西方人先说了一句,开始了聊天:“这么远的征途,你们一定都很累吧。”

“没什么,我们都习惯了”。但他们似乎对消磨时光并不感兴趣。他们中有一个以当时人人皆知的口号朝西方人发起一连串的质问。他很生气地问道:“你们要把这座山从我们这儿搬走,并在这儿建立起你们的洋教育吗?”

西方人回答说:“但我们没带走任何东西。即使我们想搬这座山,我们也搬不走它,并且,我们仅仅是添加了这里以前没有的东西。你们自己的同胞从一开始就与我们合作;中国人愿意承担资助学校的义务,并且参与学校

的行政工作,我们对此很高兴。”

后来他把话题转到外国租界问题上,这些西籍人士同意他的意见,认为任何条约赋予的治外法权都应放弃;创办教育事业应取决于双方相互尊敬、理解中产生的深厚友谊,而不是“不平等条约”。

行军的命令缩短了说话时间,士兵们扛起枪又出发了,他们在后面推着橡胶轮胎的轻机枪,那位年轻的军官显然还没有被说服,临走时说了这么一句话:“在我们取得军事胜利后,我们再收回教育主权。”他很自信这些西方人将会欢迎这一天的到来,所有的教育都由中国人自己来管理、维持。

撤退时期

1927年3月24日发生了南京事件,南方军队朝外国人居住区开枪,这之后,美国总领事高斯(Gauss)建议在杭州的所有美国人都立即撤离,3月27日一辆专列把他们运到上海。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为“撤退时期”,因为全部传教士都跑到上海避难。这时之大由中国教员负责管理,吴维德任主席。他们在困难的形势下度过了几周,因为一段时期以来,公众意见很大程度上受到俄国共产主义的影响。

大约有90名学生在春季学期返回,带来他们家乡被洗劫和焚烧的悲惨消息。米价暴涨,学生注册人数锐减,尽管美国的差会增加了拨款,但在学期末,学校财

政仍有亏空。

几个关于学生的统计

1925年10月,在一份送给学校董事会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教务长吴维德要求注意以下事实:从1920-1925年的五年间,学生入学人数增长了120%,即从68人增到148人。关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116名学生(占72%)是基督徒;95名学生(占64%)属长老会;21名学生(占14%)是牧师的孩子。

在统计方面追溯得再远一点,我们发现在葛德基1926年出版的著作《中国的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中,记载着之大共有218名毕业生,其中,48人是神职人员(是中国教会大学中人数最多的);94人担任教员,其中81人在教会学校。

第五章 立案失败与学校关闭

1917年5月8日,之大董事会第一次郑重提出立案问题,并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负责研究向中国政府教育部立案的可行性。教育部刚刚发布了技术与专业学校条例,规定外人所建学校立案后,将会和私立学校被同等看待。但直到1931年,之大才最终完成立案。

在这次董事会议上,校友们第一次向董事会陈述了向政府立案的充分理由:

(1)如果学校不立案,政府不会承认它是第一流的学校,它的学生在出国留学或进入高等学府深造方面将不会很顺利。

(2)未立案学校的毕业生没有选举权。

(3)立案将会得到当地的支持。

(4)政府批准立案将会从公立中学吸引一些学生,而目前这些中学很少有人进入之大读书。

(5)立案后必然要采纳一种能在教育部所要求的学术与工作量标准之间平衡的课程。这不会废除或削弱宗教教育,也不会要求灌输儒教或其他非基督教教义。

(6)立案会使我们预防类似在今日日本存在的现象,那里的基督教学校在公众心目中已被公立学校所取代。

董事会在下一年(1918年)的年会上同意“在之大目前章程和政策基础上”向政府申请立案。它还建议采取措施在美国获得特许状,“能颁发学位,并且无论从哪方面都不与在中国政府立案发生冲突。”

按董事会提出的条件,学校不可能获准中国政府的立案,这事被搁置了多年。1927年的革命之后,国民党掌握了政权,建都南京,立案一事再次提出。新教育部发布了修订后的更严格的立案条款:要求所有学校校长必须是中国人;中国人在董事会人员组成中必须占多数;宗教课改为选修课;学生选修宗教课必须出于自愿;教会学校必须向政府立案并遵循规定。

这些规定的意义在6月29日更加清晰了,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蒋梦麟博士会见了费佩德博士、阿诺德博士(Julean Arnold,时任驻上海商务参赞)和国会议员达耶先生(Dyer,正在远东访问)。蒋厅长坚持所有教育机构都应置于中国行政管理之下,宗教课必须改为选修,而不是必修。

为执行这些规定,费佩得校长辞职以使中国人担任。在1927年8月25日的监事会(现称为董事会)会议上,大家同意了费佩得的辞职,选举朱经农博士为校长,并同意在差会及母会董事会在向新政权立案问题上的政策明朗之前,朱暂不就职。在这个会上,费佩得当选为副校长,吴维德当选为教务长。在过渡时期,上海商务印书馆

的英文编辑兼监事会主席李培恩应邀参予大学的工作,解决行政管理中的一些问题。

1927年秋天,学校开学时只有110名学生,因为父母不愿把孩子送到动荡不安的地区,这时孙传芳将军的军队把国民党的军队又赶到杭州。学生中非教徒的比例比以往大多了,其中许多人被怀疑为政党甚至是共产党控制。学生党部以优秀学生中的四个人名义伪造了一封信,攻击另外十个人是共产党,惹下了很大麻烦。当这封信被证明是伪造的时候,这四个人都遭逮捕,但有一个人逃脱了。李培恩向教育厅党部汇报了这件事,希望能预先化解学生的麻烦。最后,有三十名或更多的学生被开除,期末考试只得推迟到下学期开学。

这一年尽管有这些困难,但还是完成了许多建设。王福泉是杭州著名的运动员之一,后来担任体育教员,在他的热心指导下,大学运动队赢得了本市三项锦标赛冠军——足球、篮球和羽毛球。1928年5月,举办了本校历史上最盛大的春季田径运动会,大学附属的教会学校以及公立学校都参加了。甘卜游泳池这时也正式开放。游泳池的建设是在副校长费佩得的监督下完成的,他和夫人一直对美化校园怀有兴趣。三年来,费佩得指导来自上海Yokohama苗圃的日本人Tomochika先生种植了6200株松树和6000株日本香柏,还有许多灌木和花草。已建成了三座或四座有吸引力的具有乡村气息的看台,草坪和道路也有改善。这年完工的其他建筑有在二龙头的实习学校,一龙头上面的两栋教工宿舍,其中一栋

是给教务长吴维德住的,这是匹兹堡的威廉夫人(Mrs. William M. Mc Kelvey)送的礼物。

学校从表面看起来一片光明,然而在向政府立案问题上的许多反对意见影响了学校的前途。在1928年5月1日的监事会上,哈得逊博士(Dr. W. H. Hudson)声明华中差会不同意学校立案,除非政府做出几项让步:(1)立案条例允许大学公开表明它的基督教目的;(2)立案后允许大学创立者拥有绝对的宗教教育和崇拜权。很多人同意他的意见,有几人希望在学校完全关闭和丧失基督教品格和目的的两难之间寻求解决办法。会议授权给纽约发电报,要求董事会在宗教自由的基础上批准立案。

1928年6月18日,学校收到差会董事会执行委员会的电报:“执行委员会不同意之大立案及其计划。”但立案申请书早已送到了教育部。不幸的是,省教育厅把中央政府制订的条例执行得更过分,即要求差会所有学校都要由全部的中国董事管理。虽然这一要求后来被修改,允许一些差会代表担任董事,但这一事件引起了差会教育家的极大忧虑和不安。省教育厅的做法最后还是被南京中央政府教育部否决。

学校关闭

长话短说,1928年6月21日,监事会执行委员会在长时间考虑之后,一致同意关闭学校,直到差会经费资助

和向政府立案问题得以解决,这两个问题使行政部门头痛。执行委员会发给美国的董事会电报如下:“关于你们发来的电报——你们的决定令我们失望之极——请再三考虑——立案是必须的——否则,这学期只能被迫关闭学校。你们愿意承担责任吗?必须在6月26日之前做出答复,否则不能撤回协定。”

但直到7月2日才得到美国的答复,是威利斯先生(Mr. Willis)的答复,他声明他不用再考虑,如果基督教特征和办学目的得以保持,他不会不同意立案的。这个答复被解释成要求所有学生每日进教堂,周日做礼拜,课堂上进行宗教教育,华中差会尤其这样认为。这种解释后来被来自纽约的信确认。不幸的是,政府基于这些条件不会同意立案。

7月5日,监事会全体会议一致表决,“鉴于董事会不同意立案,同时考虑到学校严重的财政问题,为重新组织之江大学,暂时关闭学校”。

同时,6月25日学校举行了毕业典礼,三天后只剩下最后一批学生。四成学生知道了6月26日该来的答复仍没有到,就递交申请转校。他们认为没有答复就意味着相反的决定,之大不会立案的。而华东的其他教会大学除圣约翰大学外,都已申请立案,学生更愿意到这些学校学习。

很严重的财政问题源于1927年早些时候恶化的军事形势,学生人数减了六成。大部分学生实际上无法穿过战线到达杭州。这导致学费流失,在十八个月里损失

达 11 000 墨元。在这些事件之前,根据 1926 年差会采纳的五年发展计划,要求在美国的董事会从两个差会中各得到 9 000 墨元的经费支持(这不包括传教士的工资),取代以前的 8 000 墨元。不幸的是,差会拨款不但没有增加,反而降至 7 500 墨元,总共只得到 15 000 墨元,按当时汇率折合 6 700 美元。财政问题是考虑关闭学校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闭学校对中西教职员来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中许多人分散在中国从事其他工作,而许多外国教员返回美国。王令廉夫妇和队克勋夫妇于秋季返回学校照看财产,并做一些乡村福音工作。去年冬天曾在大学遭难的村民现在把他们的家奉献出来用于祈祷和主日学校。他们亲眼目睹北伐对乡村的破坏。他们的房屋被洗劫,井里被投毒,果园被砍伐,无知的孩童捡起军队遗弃的手榴弹玩耍。这时他们转向宗教寻求安慰也就毫不奇怪了。

在队克勋访问乡村时,他发现寻求安慰的人们大多数崇拜传统的道教和佛教神像,如一些彩色的木刻品,石版画,或是手绘卷轴。他从中国各地收集了 2 000 幅这样的图画,并分析村民寻求的基本宗教价值,1940 年他出版了《中国农民信仰》(*Christian Peasant Cults*)。^①

费佩得博士利用这一年的空闲时间出版了《杭州旅

^① 由上海别发洋行(Kelly and Walsh Ltd.)出版,内有 16 张彩色插图。不幸的是,日军进攻上海时毁掉了首版 1 000 册中的 700 册,因此只有几册到了美国。

游图》(*Hangchow Itineraries*)的修订本,是一本关于杭州附近寺庙的导游图,还出版了一本关普陀岛寺庙的导游图。^① 来这两个重要佛教中心参观的许多游客都需要这两本书。

学校关闭后的 1928 夏天,一名教员毕范宇牧师也许是第一次将孙中山先生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讲译成英文,所有学校都要求学生阅读其中文本。毕范宇先生的译本题目是“三民主义”,在西方人和阅读英文的中国人中间广为流行。^②

^① 由别发洋行出版。

^②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第六章 学校重新开办 采纳男女合校

1929年秋天,在之大校友要求学校重新开办的强大压力下,李培恩,这位1910年的毕业生,代理朱经农校董之职,努力工作了三个月,把之大作为联合的教育机构重新组织起来。李培恩有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和纽约大学商业管理硕士两个学位。他说服1927年的毕业生黄金担任教务长,黄是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文学硕士,然后,他又着手召集教员,做广告招收学生。

政府一开始拒绝让之大重新开办,因为它虽然申请了立案,但并未获准。但最后,在1929年9月,大专和高中还是获准开学,学生总数是350人。有900人参加了入学考试,尽量招收素质最好的学生,但他们很多人被可能的麻烦制造者掩盖了。以前的学生没有一个返校,招收的学生中只有20%是基督徒,虽然85%的学生自愿选修了宗教课程。

在那个秋季,之大历史上第一次招收女生,有18人通过入学考试。以后几年人数有所增加。男女合校是向政府立案的先决条件。

教员队伍的重建

代理校长李培恩请马尔济先生任理学院院长兼生物系主任,他本人任文学院院长,在经济系开一些课程,他用他能支付的薪水组建了强大的教员队伍,使学校得以开办。资金问题需要精打细算,因为之大是“在资金极为匮乏的情况下运转的”。来自两个差会的拨款已降至5992.28美元;不足部分必须取自学费或其他中国来源,而且要付给教员相当丰厚的薪水,否则他们不会来。那年每月付给中国教员的薪水标准是:教授275元(中国币);副教授200元;助理教授140元;讲师90元。

在文学院,教务长黄式金任教育系主作;罗天利在政治与历史系任职,顾敦铨任其助手;郭礼赅(A. R. Craig)任哲学系主任,宗教生活主任;李培恩教授体育,并在宗教生活方面协助郭礼赅;胡继瑗任经济系主任,兼院长助理和注册员。英文系是为队克勋开办的,他那时正在美国休假读博士学位;钟钟山是国文系主任。他在任期间吸引了一位杰出的古典文学学者来校任教,为国文系和之大创出了令人艳羡的声誉,他还创立了一座收藏中国古典文学的图书馆,它成为本科院校中第二大此类图书馆,也是全中国最完备的图书馆之一。

在理学院,马尔济和潘先生(Percival P. Pan)负责生物系,创建了一个收藏丰富的动植物标本室;夏课勤(James L. Howe)和陈先生(Grahamchen)负责化学系,编